



2009年12月31日第30期

总第四十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本期目录

支左专辑

文摘

[启之 “七二〇”事件的预演](#)

[高振河 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

[李振祥 47军走访组回湘汇报座谈否定“文革”（节录）](#)

故纸堆

[1967年中央对青海、安徽、内蒙、福建等12省、区支左的批示（摘录）](#)

[四川省江油县支左部队转变立场的三个文件](#)

[重庆日报 五十四军党委总结文革支左教训](#)

闲读偶记

[董国强 对《许世友将军逸事》的几点补正](#)

蓦然回首

[愚人 军宣队在山西省歌舞剧院](#)

昨日心迹

[胡春浦 王排长的“德政”纪要](#)

年终感言

[本刊编辑部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编读往来

[一、丁东建议提高质量](#)    [二、庄菁瑞认为众口难调](#)

[三、马文蔚主张尽量短些](#)    [四、蔺杨对文革研究者的希望](#)

全年总目录

[《记忆》2009年分类总目录](#)

---

【文摘】

按：1967年4、5月间，即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的两三个月之前，在呼和浩特和北京两地爆发了内蒙支左军人公开抗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即“红八条”）的严重事件。这是一个当时未引起“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视，至今亦未引起文革历史研究界重视的事件。实际上，其性质，其规模，以及事后的处理，都完全是随后发生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的预演，堪称内蒙版的“七二〇”事件。只是因为军人的愤激抗议发生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眼皮下，而未像武汉事件那样直接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因此未能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下决心改变部署。由此可见，即使后来没有爆发武汉“七二〇”事件，也必然会在别的地方爆发“八二〇”、“九二〇”之类同样性质的事件。这是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本文节录自香港天行健出版公司即将出版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 [“七二〇”事件的预演](#)

### [——内蒙古军区与保守派“全力对付北京”](#)

#### [启 之](#)

（1967年2月16日）第二次接见内蒙古的代表时，周恩来发过一番感慨：“我和解放军谈话几分钟就能解决问题，和红卫兵则要好几个小时”。（《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内蒙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2月16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

发《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1967年4月）“红八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1967年4月13日）下达后，内蒙古军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北京，有时候，解放军比红卫兵更难对付。

从4月中到6月中的两个月时间里，内蒙古军区和保守派进行了以“全力对付北京”为宗旨的大规模的反抗。（见《彻底清算黄王刘张反党集团策划的我军历史上未有的一系列反党罪行》，1967年9月23日《红色战士》）攻打师院、围攻滕海清、静坐中南海、火烧党委大楼、大闹人民大会堂、困守工会大楼等事件此伏彼起。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几千名内蒙军区的军人在政协礼堂冲上主席台，痛殴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路扬等人。

4月14日“红八条”传到呼市，“周恩来是两面派”、“打倒康生”、“与中央血战到底”、“砸烂高锦明的狗头”、“与呼三司决一死战”、“强烈要求中央撤销八条”、“重审内蒙问题”等标语立即出现在青城的大街小巷。（秦学《黄王刘张反党集团是革命人民的死敌》，1967年8月11日《红色战士》）下午4时，“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保守组织的骨干在工人文化馆召开“誓师大会”。会议声明：即使被打成反革命，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干到底。会议决定：1、决不解散。2、赴京告状。3、就地示威。当晚，二百余人拦车赴京。“半路铁道部来电命令列车工作人员动员他们下车，由于值班工作人员是‘红铁战士’，根本没有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组《呼和浩特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续二，1967年7月20日《农民运动》）

第一批告状的人在北京东大桥接待站建立起上访告状指挥部，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指挥部”。在呼市方面则“发生严重拦车事件，四十四次列车误了三个半小时。”拦车是为了上访。此后，内蒙古赴京告状的人们蜂拥而至。工、农、学生、军人，各行各业；误点、殴斗、拦车，无日无之。内蒙古形势严峻

4月18日上午，华北地区晴空万里。呼市、包头、临河、赤峰、海拉尔等城市上空出现了军用飞机，飞机过处，雪花一般的传单纷纷扬扬，徐徐飘落。这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领导小组致内蒙古各地群众组织和当地驻军的信。信中说：“1、‘红八条’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2、不要受坏人挑动和蒙蔽。3、

不准继续赴京，更不得拦阻火车、妨碍交通、破坏生产。”（出处同上，4月18日）保守派对此嗤之以鼻，不但拦车赴京的人有增无已，而且在北京越闹越凶。他们到华北局索要纸张、笔墨、宣传材料和汽油；不给，就大骂“饭桶”、“官老爷”；华北局办公厅副主任赵瑾卿成了他们的人质，从华北局押到中南海，又从中南海解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出处同上，4月21日）

4月21日下午，中南海西门外出现了五百多人的“内蒙古赴京代表团”，他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门口静坐，周恩来不接见，我们不离开。”与这些人同时出现的是三条大标语：“毛主席啊，内蒙古一千三百万人民想念您！”“强烈要求重审内蒙问题！”“强烈要求周总理接见，反映内蒙情况！”一张题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锦明六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贴在标语的一侧。（出处同上）静坐持续了六天六夜，周恩来不得不承认：“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可以说还是头一次。”（《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谈话》，4月27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年6月5日）4月27日，静坐以中央让步而告终。“两面派”周恩来、应打倒的康生、说话难懂的陈伯达和很快就成了“小爬虫”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了他们。

接见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内蒙保守派三千多人，呼三司几十人参加接见。还有为了维持秩序的北京“红代会”数千人。大会先由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代表军区主要领导——萧应棠、刘昌、黄厚、王良太做检讨，刘华香在检讨中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犯了带枪的刘、邓路线的错误，实际上是目无中央，目无军委，夺权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态度，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思想上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绝对化，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我们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们向党中央请罪。”今后一定“帮助革命组织发展壮大，对保守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教育。”（《刘华香检讨》，4月27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年6月5日）随后，周恩来、陈

伯达、康生等人讲话，宣讲“红八条”，劝保守派听话。会场上的反应异常热烈——在周恩来不足两个小时的讲话中，口哨声、口号声、跺脚声、起哄声达五十余次。“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请听我讲”，有几次周恩来一连喊十个“同志们”，会场仍骚乱不已。康生怒斥：“不要捣乱！”“不愿听的滚出去！”（《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赴京上访人员时的谈话》，4月27日）自文革以来，中央开这种会还是头一次，但是，它远不是最后一次。

滕海清是4月18日抵达呼市的，如果知道来内蒙古的下场，这位中将司令员是绝不敢踏上这块土地的。在他来之前，内蒙古已经成了一个点燃的弹药库。“红八条”还未正式传达，造反派就被打伤了十余人。呼市街头还布满了保守派杜撰出来的周恩来“三点指示”、“四点指示”。广播车告诉人民：周总理发出指示——“八条是假的，已夺权的单位保持不动，个别错了的要纠正。”“对群众组织不能解散、不能取缔，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红八条”下达后，上万名保守派举行昼夜游行，军区战士数千人戴着“红色工人”、“红色战士”、“无产者”的袖章，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把滕海清、吴涛从军区赶出去”的口号，大搞武装游行。军人们说到做到，偌大一个内蒙古军区，竟没有滕代司令员、吴涛政委的立足之处。他们不得不在新城宾馆下榻。4月19日晚11时，几十辆满载“无产者”、“红卫军”的汽车包围了新城宾馆，北京军区驻宾馆的战士被打，人们高喊着“找滕海清、高锦明算账”的口号冲进宾馆，内蒙党委办公厅秘书张鲁被当作高锦明的秘书饱尝老拳，滕海清在造反派的保护下从后门逃出，逃到由北京部队接管的呼铁局。

第二天，又有六、七百人冲进宾馆搜寻滕、吴、高。风闻高锦明躲进了呼市公安局，这些人马上将公安局包围起来。有人提着手枪寻找高锦明，幸亏高不在这里，否则此后的“挖肃”运动就会减少很多有声有色的故事。

第三天，围攻者转向省公安厅，又包围了呼铁局，如果不是北京军管部队的拼死保护，这两位汉、蒙将军今后的亲密合作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五天后，滕海清在军区做报告时，遭到军人的围攻、辱骂，滕的高血压复发，住进了253医院。

这期间呼市街上，反中央的大字报更上一层楼，很多大字报众口一辞：“周总理为什么反不得？”公安厅贴出了《十三个想不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

事记编写组《呼和浩特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续二) 财贸“北斗星”质问中央《十五个为什么?》(同上), 军区“人民子弟兵”的疑问更多, 他们要求中央回答《二十一个为什么?》(同上), “红铁战士”提醒人们“用毛泽东思想想一想, 为什么《八条》下达后, 广大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痛哭流涕, 而被红卫兵查抄的地、富、反、坏、右全家吃饺子?”(同上) 中山东路的墙上贴出《给滕代司令员的一封公开信》, 信中责问滕海清: “你是呼三司的司令员, 还是内蒙军区的司令员?”(同上) 造反派毕竟眼光远大, 这一片嘈杂叫嚣并不妨碍他们胸怀全局——“呼三司”、“818”、“火车头”等十七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了《关于乌达矿区局势的严正声明》, 坚决支持千里之外的同派组织(同上)。

大字报贴得再多也只是宣传。打、砸、抢才是理论联系实际。4月中下旬, 武斗之风迅速蔓延。百什户的农民乘六辆汽车进城, 专程袭击土默特小学, 因小学生前一天向他们扔草棍而大打出手(小学生向他们扔草杆, 意在“说他们捞稻草”。出处同上)。首都红代会赴呼宣传队在军区北大门外遭到三百余人的围攻, 司机被打昏, 数十人受伤(同上)……无政府主义泛滥, 工交瘫痪, 纲纪废弛。烟厂锅炉房工人因派性斗气, 擅离职守, 致使锅炉烧坏(同上)。“军区大院乱得像市场一样”(周恩来语, 《1967年5月19日周总理和肖华同志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 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 1967年6月5日) 平民百姓出入如履闹市。军官、战士赴京离呼, 持枪游行如入无人之境。三个月后, 军区政委吴涛在部队整训汇报会议上披露了当时内蒙部队的“盛况”: “4951部队, 中央决定下达之后, 一个武装连上街游行, 对抗中央, 这是我军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事件。总政检查组检查他们的工作, 他们竟敢撕毁检查组的材料、摔缸子。在紧要关头, 军区调他们执行任务, 他们拒绝执行, 按兵不动。他们的政委在北京, 我们叫他回来, 他不回来。看, 他们目无组织, 目无党纪军纪国法, 问题是多么严

重啊！4931 部队有一半的人出来，散兵游勇，上街游行，背叛中央。4754 部队某连有些战士，跑到北京组织地下连队，一个副排长任连长，一个卫生员任指导员，下设勤务组、宣传组、工厂组、农村组，组织得很严密。好像现在是天下大乱，到了‘司令赛牛毛’的时候了，拉出一股部队，他就是司令。工兵部原副主任×××把几个工兵部队脱离建制的战士，组织起来编成几个支队。警卫营警卫军区大院，‘八条’下来对抗中央，对保守组织开的是绿灯，军区大院随便出入，成了‘东安市场’。他们的部队风气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一个连有时集中过七十多个女的，站岗还有女的陪同。”“通讯营某连，他们本来在巴盟执行架线任务，可是，‘5·10 事件’发生后，他们擅自离开战斗岗位，返回呼市。七班长带领七班到工会大楼，保守组织顽固地死守工会大楼反抗中央时，我们有些领导人号召给予‘布施’，捐款献粮票支持。呼和浩特军分区，从蔬菜公司借了二十多床盖冬菜的大棉被，说是给支左部队用，结果送到工会大楼给保守组织。”（《吴涛政委在军区部队整训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967 年 7 月 6 日《红色战士》）

面对这种混乱状况，4 月 20 日军区发布两条命令：一、禁止上街游行，控制车辆，如有违反，按破坏军纪论处。二、干部要旗帜鲜明，不得接见保守组织代表，不准向他们招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组《呼和浩特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续二）4 月 28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达六点指示，正告内蒙古军区必须坚决贯彻“红八条”，“对抗中央是绝对不允许的”，“上街游行，上北京告状，也是完全错误的。”（《总政治部关于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指示》，4 月 28 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 年 6 月 5 日）尽管如此，武斗仍在不断升级。从 4 月下旬到 6 月中，规模越来越大，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双方越战越勇，其中不乏军人。

4 月 22 日上午，军区造反派与地方保守派在军区南门发生冲突，打伤两人，毁车一辆。下午 3 时许，两派又在第二毛纺厂门前武斗。6 时许，保守派群众分乘 90 余辆汽车开到师院北门，高喊反八条的口号，里面的造反派照相，外面的人遂往里冲并大扔砖头、石块，里面的人受伤者数十，但仍坚守大门。外面的人

索性将院墙推倒，三百多军人和工人蜂拥而入，在砖头、木棒的攻击下，守门的学生星散逃逸，受伤者无数。晚9时，又有百余军人手持皮带闯进师院，见人便打，直至凌晨方去。（内蒙河西“818”革命造反团1967年5月15日编写《四·二二事件真相》，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彻底砸烂地下黑司令部》辟谣选编之三，1967年7月）

4月25日中午，几千名保守派乘百辆汽车到农牧学院门口示威，下午2时许，五百多军人，四千多工人以砖头、皮带、树枝为武器攻入大门，打伤58人，重伤13人。3时许，这些人又高喊着“打倒大学生”、“还我战友”、“工农兵万岁”等口号，由军人开路，攻入学院。闻讯赶来的造反派奋力抵抗。北京、上海、哈尔滨赴呼的造反者亦投入战斗。内蒙古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向全市造反派发出命令：“全市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坚决自卫反击。”（同上）一时间，高等学府成了血战的沙场，双方一直打到天黑才鸣金收兵。

有趣的是，尽管交手时双方都力图重创对方，可事后都竭力扩大对方的战果，宣传自己如何无辜受难，如何损兵折将、死伤惨重。在这方面内蒙古军区表现得格外出色。据军区统计，“东纵”的汽车压死了解放军6人，用刀子杀死了3人，送医院抢救的伤员87人。25日晚，张德贵亲自赶到253医院，指示医方：“能收的都收，都免费。”然后，他泪眼婆娑地与87名伤员一一握手，并组织慰问团到医院参观。（同上）“包头、集宁、伊巴两盟成批来人，26日那天院内就来了四千多人。”（同上）可是，据军区总医院医务处的布×、刘××揭露：“当时来一个收一个，两口子打架打坏了，也说是三司打的，来了也收。当时收的人，多是游行过度疲劳，休息一下就可以了，来了后以‘脑震荡’收下了。”（同上）外科医生慕××补充说：“当时不管有伤没伤的都用车推或担架抬进来，该收的收，不该收的也收。”（同上）门诊部护士夏××告诉人们：“来门诊的本来都可以走，可为了造声势非得要车子推，再不就是抬，到了病房，伤员能从车上跳下来。为了扩大事实，小伤口贴上一块很大的纱布，有的头上还给缠上很多纱布，不想住院，还动员人家住院。”（同上）



倒戈的军官坦白：死人的事与“东纵”无关。4931部队的战士张之樑就是军区制造的“死者”之一。张之樑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4月25日这天‘东纵’正开斗争王铎的大会……到了农牧学院，我也往里冲，就在这个时候，我背后有人隔着我的头拿皮带打农牧学院的学生，误打在我的脑门子上了，当时，我只感觉到有人从后面抽了我一脑门，很疼，但不知已出血了。等他们往外拉我，我一回头，他们发现我脑袋上流血了，就大喊起来：三司打解放军啦！给武斗火上浇油。我想起军区招待所布置的两个绝食参观现场，认为必要时伪装一下也可以打击敌人，所以我就在保守派大喊大叫的时候，把眼睛闭上了。他们就用雨衣蒙上我的头，把我送到253医院。当时流传说三司打死了6个解放军，我大概就算其中一个吧。住院后，先给我送到了处治室，我以为给我包扎，谁知道是先给我照相，后来才送到外科病房4号5床，还不给我包扎，又给我拍照，我心想，幸亏我是装死，要是真的遇到致命伤，还不耽误死了……住院后还造假病例，我明明是只擦破点皮，流些血，可他们却在我的病例上写到：中性脑震荡，小腹被踢伤，下肢被打伤……他们还平白无故的给我输液，我直害怕给我输坏了。还给我吃半流质，我这么个大小伙子，每天吃半流质受得了吗？幸好护士看我饿的够呛，就给我打双份饭……我们一病房共七个人，没人来看的时候，我们说说笑笑，玩军棋、打扑克，一个个生龙活虎。参观的一来，我们马上鸦雀无声，一个个老实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装病……过了几天，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躺在床上装模做样的生活了，听说当时去北京的人很多，听说我的那件带血迹的血衣也送到了北京，我就从253医院逃出来，扒车上京告状去了。”（4931部队战士张之樑《反党集团蒙蔽和毒害战士的罪责难逃》，载1967年6月24日《红色战士》）

进入5月份，两派武斗推向高潮。5月10日晨，保守派砸了外贸局土产公司，抢走了两汽车锹把。下午两点，在赛马场开会。此会的目的是全市总动员，抓高锦明、砸红旗总部、占领党委大楼。会后，几千名保守派在曹文生、张三林的指挥下，先砸财经学校，再冲党委大楼。一楼很快被占领，但通往二楼的三个楼梯都被造反派用木板钉死，易守难攻。攻方成立敢死队，以大锤、铁镐为武器，猛砸木板，不成；又以毛主席语录牌为掩护，用铁钩、绳索拽开木板。守方见状，

砖石齐下，攻方改为水攻，又不成，旋即放火烧楼。同时，架起长梯向守方的背后二楼阳台发起强攻。攻方火攻了四次都被扑灭，阳台战斗亦失利。无奈，只得把矛头转向食堂——米、面、油、糖、肉被抢劫一空。医务室亦被扫荡，药品、器械席卷而去。同时断电断水、抢砸汽车……呼三司、“8·18”、“火车头”等造反派赶来增援，在党委大院内外开辟了第二战场。中央得讯，驰电慰问造反派，指令北京军区派兵救援。造反派和解放军并肩战斗，经过一夜激战，攻方终于败北、总指挥曹文生、副总指挥张三林等头目被捕。党委大楼一片狼藉，机要文件，档案全部被抢走，墙上还留着保守派的恨恨之言：“滕海清从内蒙滚出去”，“油炸高锦明”，“打倒红八条”！此役双方伤者无数。（内蒙河西“818”革命造反团，1967年5月15日编写《五·一〇事件真相》，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彻底砸烂地下黑司令部》辟谣选编之三，1967年7月）

5月13日，河西公司“8·18”向保守组织“红联”索要被抢走的广播器材，“红联”正在开会，认为“8·18”故意捣乱会场，即调集数百之众将“8·18”代表扣押。“8·18”余众急忙后撤，“红联”穷追不舍，各路造反派飞车增援。双方激战经时。军代表和警卫连面对如此“盛况”无计可施，只能在抢救伤员上贡献绵薄。事后，“红联”成员逃遁外埠，长期不归。据“8·18”单方统计，此役伤130余人。其中重伤30，急救8人，生命垂危者2人。（内蒙河西“818”革命造反团，1967年5月15日编写《五·一三事件真相》，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彻底砸烂地下黑司令部》辟谣选编之三，1967年7月）

根据当时内蒙古的各类小报公布的数字，自4月13日至5月13日的一个月內，呼市地区保守派（包括军人）上街游行示威者达十万人次，出动汽车七百余辆，参加武斗三万余人。有三千多军人不归营房，脱离建制。造反派方面上街游行的不多，出动车辆也大大少于保守派，因为他们正忙于落实“红八条”——把仇恨集中在走资派王铎、刘景平、周吉、沈新发、张鹏图、赵会山等人身上，大开特开批斗大会。但其“被迫反击”、“英勇自卫”的人数也并不少于挑起武斗的保守派。

在这一个月中，因武斗致伤者一千三百余人，重伤三百人，致死者十余人，

如师院学生：欧阳儒忱、许克灯、罗德营、王林洪、林振山等。（内蒙党委红旗联合总部代表在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学习大会上的发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斗争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内蒙党委红旗联合总部编印《文革资料》11，1967年9月）华建工人：姚绍宝；解放军战士：绍德胜等。比起这些亡逝者来，韩桐（1967年2月5日在“呼三司”围攻内蒙军区时被军区干部柳青开枪打死的内蒙师范学院学生）要幸运得多，至少人们知道他是谁打死的，至少，他的家乡托克托县还有一块立了十年的墓碑，还曾经有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

在内蒙古的文革史上，先后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直接性暴力潮和两次因无政府主义泛滥而造成的局面失控。第一次暴力潮和第一次失控发生在1967年2至6月间，即4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前后这段时间里。和其它省、区同步，内蒙古的这种局面是由全面夺权和军队支左引起的，是新的意义上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构成的两大势力集团冲突的产物。4月13日“红八条”下达后，直接性暴力行为和局面失控是相关的。“红八条”对保守派和内蒙军区不留余地的绝决态度导致了两个直接后果，第一，当时唯一运转的、最有能力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机构——内蒙古军区陷入了混乱和瘫痪之中。军区领导人黄、王、刘、张在向干部、战士们传达“红八条”时个个老泪纵横，将士们哭成一团。他们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军区领导人对“红八条”的看法极其一致。黄厚的反应是：“不合乎实际，多数思想不通。”“我也糊里糊涂的，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见《披着羊皮的一只饿狼——黄×反党活动的大事记》，载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王良太的反应是：“八条是要修改的，现在要顶住。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见《反党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头目王××反党罪行》，载1967年9月26日《红色战士》。刘昌的反应是：“真是难受死了，还不如把我撤掉呢！”见《蛇一样的恶人——刘×反党活动大事记》，载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张德贵的反应是：“同志们想不通是对的，如

果想通了就坏了。想不通是有阶级感情。”“有些问题我也理解不了，解释不了。”“三司大方向始终正确？我闹不清楚，让历史作证吧。”见《道貌岸然的魔鬼——张××反党活动大事记》，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而那些在左倾路线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指战员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能“镇压反革命”？4月13日后，滕海清、吴涛自顾不暇，内蒙军区的其他领导几乎对一切都撒手不管。经验告诉他们“越管越犯错误”。非但不管，他们还或明或暗地鼓励、纵容战士们对抗中央、鼓动、赞赏保守派四处闹事。至于区党委方面，王铎、王逸伦垮台之后，高锦明等“反乌英雄”成了保守派砸烂的对象，保命不迭，哪里还顾得上管事。这样一来，内蒙古在4至6月间就出现了“权力真空”。第二，中央八条强令解散的“无产者”、“工农兵”等保守派面临沦为社会贱民的前景，不得不铤而走险，与命运、与对手做殊死斗。他们挑起武斗的目的和军区领导的做法是一致的——压中央、改八条、重做结论、重分权力。因此，在军区和保守派看来，局势越乱、武斗越凶，对他们越有利，越有可能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上来。

造成直接性暴力潮的另一个原因是民族问题，和军区领导层打击吴涛的理由一样，随着乌兰夫的倒台，蒙族在内蒙各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迫害。大多数蒙族干部，尤其是旗、县、公社、大小队的基层干部都被打成乌兰夫黑帮。抄家、批斗、拷打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1967年2月以后，随着政府控制力的削弱，对蒙族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一些蒙汉族杂居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民族迫害事件。如“呼市郊区桃花公社的59户蒙民中就有25户被抄家、批斗，十几个蒙民平白无故遭到毒打，其中有9人被打成重伤。”（**呼和浩特郊区桃花公社采访记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民族问题的暴力行为与派性武斗有很大不同——与后来的“挖肃”运动一样，蒙族处在挨打的地位。他们既无权“文攻”更不能“武卫”，其唯一的自卫方式就是自杀。这就使此间的暴力潮具有了民族迫害的性质，带上了更悲惨的色彩。

内蒙古的局势引起了北京的极大关注。5月10日保守派火烧党委大楼，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等候内蒙的消息，一直坐到天明。（《**周总理和肖华同志接见内蒙军区警卫营代表的谈话纪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德贵说得不错，“事情闹大了，

总有人管。”（《道貌岸然的魔鬼——张××反党活动大事记》，1967年7月22日《红色战士》）在北京上访、呼市武斗的两面夹击下，中央再也坐不住了。

5月16日上午，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三方面给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开个会，劝他们回去照八条办事。当天晚上，周恩来、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叶群等16位中央首长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了两千七百余名赴京战士。（《1967年5月16日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记录》，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二集，1967年6月5日）接见之前，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召集军区各方面的领导开会，研究了对付中央接见的三个方案：如果是多方面接见，就呼口号，退出会场。如果单方面接见，就向中央施加压力。如果主席接见就控诉呼三司。王良太另外还有三条指示：1、如有首都院校的人在场，就退出接见。2、如果吴涛参加接见，就把他撵出去。3、向中央递材料，说明真相。（《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反党活动大事记》，见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参见《反党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头目王××反党罪行》，1967年9月26日《红色战士》）因为这次接见是单方面的，所以军区方面按第二方案进行。

周恩来一出场，会场上一片呐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周在台上解释八条决定，台下则以“打倒高锦明”“打倒吴涛”等口号回答。第一夫人先用好话哄：“我非常体会会场的沸腾情绪。”继而来硬的：“你们这样闹是不妥当的！”无奈下面的人软硬不吃，会场更加混乱，情绪更加“沸腾”。聂荣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抬出林副统帅的金科玉律吓唬人：“林副主席说：‘立场错了，全盘都错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可是这些无法无天的内蒙军人不但不理解的不执行，就连理解的也不执行了——不管台上如何强调内蒙古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如何解释毛主席工作多么繁忙，台下的两千多条喉咙仍一个声音地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周恩来苦口婆心：“你们没有责任，是无罪的。”江青好言相劝：“你们没有责任，中央不责怪你们。”叶群随声附和：“中国有句老话，‘不知不罪’。广大指战员是无罪的。”可惜，这些劝慰之言迅即淹没在混乱和愤

怒的海洋之中。终此会，台上是声嘶力竭，好话说尽。台下是哄声四起，群情汹汹。向台上递条子，送材料的军人接踵挨肩。坐在主席台一侧的第二夫人叶群成了接收材料的三等秘书。（《1967年5月16日周总理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内蒙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记录》）这次大会，除了得到了一大堆告呼三司、告高锦明、告吴涛的状子之外，中央什么也没有得到。会后，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到总参招待所看望这些赴京军人，这些中央大员们竟在“周总理两面三刀”、“周总理是两面派”的鼓噪声中被送回了汽车。（本报编辑部《反党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头目王××反党罪行》，1967年9月26日《红色战士》）

5月19日凌晨，周恩来、萧华在人大大会堂接见军区警卫营，委婉地告诉他们，要准备集中整训。会议指定73名代表参加。结果挤进去100多人，周恩来嘱咐他们要听中央的话，服从滕、吴领导。他的话音未落，就有不少与会者摩拳擦掌要抓吴涛。

两天后的5月21日晚上，周恩来、康生、徐向前、萧华、谢富治、王力、关锋等人召见军区领导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滕海清、吴涛、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10人。这次召见一是重申中央八条不能改变，中央坚决支持滕、吴和造反派。二是命令军区的七个领导一齐说话，第二天就把赴京人员带回。“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论处）”，“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中央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三是命令军区宣布几条命令，把部队管起来，保证滕、吴的正常工作，四是正告军区某些领导，军区大批人来京闹事。在5月16日大会上高喊背叛中央的口号，这不是大多数的问题，而是有个别坏人在背后挑动。

早在3月份接见内蒙四方代表时，周恩来就发过这样的感慨：“我这个总理说话也不算数了。”（《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军区负责人的谈话纪要》，3月18日，呼市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发《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编》第一集，1967年4月）上述会议开过之后，周恩来调拨专列运送内蒙军人回呼和浩特的计划落空。会后第二天，二十余名赴京军人乘卡车冲进北京京西宾馆抓捕吴涛。幸亏吴涛不在，躲过一劫。（《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反党活动的大事记》，1967年

7月15日《红色战士》)第三天(5月24日),总政治部在政协礼堂开会欢送内蒙赴京人员。千余军人在会场上再次高呼“背叛中央”的口号,数百人冲上主席台,抢麦克风,向中央提出以修改八条决定为主要内容的五条要求,并强令吴涛签字。吴不签,战士们拳脚交加将他们的中将政委打翻在地,痛殴半小时之久。总政办公厅主任路扬和几十名警卫、工作人员也被打。会场成了战场,军人成了暴徒。酣战将歇之际,主持会议的王良太向大闹会场的将士们发问:“今天的会开得好不好?”众齐声欢呼:“好!”“王良太回到住处后洋洋自得,并喝了茅台酒。”(石宝良〔内字143部队战士〕《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揭黄、王策划的“五·二四”反革命事件》,1967年9月15日《红色战士》。又见《罪恶累累 铁证如山——王××反党活动的大事记》,1967年7月15日《红色战士》)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回光返照。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书写内蒙古的历史——5月25日,上述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毛垂询了内蒙古的事态。同时,经毛泽东和军委批准,内蒙古军区滕海清代司令员、吴涛政委发布五条命令,要点是:外出串联人员必须于5月底之前返回,过期不归者,以自由离队处理。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不开展“四大”,不许有战斗组织,不许游行、集会。教育批评不满中央八条者,对抗者给予纪律处分。反对打、砸、抢、抓。支持呼三司等左派组织。同日,中央全部收回发给军人的返程车票。

5月26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审查。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军区其他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调一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将军区警卫营、通信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调离呼和浩特,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李可 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35页。据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考证并向笔者指出,“当时调入呼市的是65军第578团,69军83团、84团、82团一个营及铁道兵52团,共同组成呼市‘前指’。谨此致谢。)

同日晚，周恩来、康生等中央负责人接见呼三司等造反派代表，传达了军委的上述决定，表扬他们听话，勉励他们戒骄戒躁，再立新功。

十五天后（6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将中央对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及其部属的处理公之于众。至此，“全力对付北京”的计划彻底破产。

乘着北京的东风，呼市造反派在北京军区部队的大力协助下，于5月底攻克保守派在呼市的最后堡垒——内蒙古工会大楼。一度拥有百万之众的保守派终于土崩瓦解。头头被捕，群众分化。经过一阵倒戈、揭发、相互攻讦、幡然悔悟的整顿之后，这些为心中的“红太阳”英勇奋斗的人们，有的失去了政治热情，有的找到了新的契机，有的怀抱着满腔悲愤，伺机东山再起。

4月13日“红八条”下达后，内蒙保守派和军区的大规模反抗使中央得到了“教训”，在5月7日中央做出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中央对军队采取了较温和的态度。肯定了他们在支左、支农方面的成绩，强调了革命组织要同成都部队加强团结，并且增加了一条，专讲拥军爱民。对保守组织也不再简单地解散，而是做了一定分析。（黄厚对《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做过这样的评价：“成都决定客观，接受了内蒙的教训。”见“本报编辑部”《反党集团的大头目 复辟资本主义的总指挥——反党集团大头目黄×反党罪行》，1967年9月28日《红色战士》）同时，还强调了一切群众组织都不许武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决定中，中央没有把军区排除在“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之外，但是，这种所谓的“教训”既没有使四川，也没有使全国的局面得到真正的改观，内蒙古则走向了更大的混乱。

---

【文摘】

## **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

**高振河**

（1967年）2月2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喻屏（注：时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同宋任穷（注：时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到黑龙江参加“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宋任穷在大会讲话中表示祝贺和支持。

会后，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宋任穷让喻屏提前赶回沈阳，筹备、组织辽宁各造反组织的大联合委员会（后简称“辽联”），藉以推动辽宁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1967年2月16日，在沈阳召开了成立大会。此后，东北局委派喻屏、辽宁省委书记徐少甫、省军区政委杨弃等参与“辽联”的工作。但是，在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后，东北局和沈阳军区在“支左”的问题上却产生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很快便导致辽宁两大造反组织“辽联”和“辽革站”之间的激烈斗争。就连东北局机关，原本对立的两派群众，也成立了两个尖锐对立的“造反组织”。一派叫东北局机关“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另一派叫东北局机关“红色造反团”（简称“红团”）。

4月上旬，“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在沈阳军区“支左”人员的支持下，“杀入东北局”，进驻东北局机关，并提出：“彻底砸开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出刘、邓伸向东北地区的黑爪牙”。东北局书记处根据当时中共中央2月21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提出“三点意见”，要求这两个造反组织撤出东北局机关。于是，两大造反组织围绕“三点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三点意见”符合中央2月通知精神；另一派说，“三点意见”是一棵“大毒草”，并提出打倒宋（任穷）、马（明方）、顾（卓新）、喻（屏）。这件事一直闹到中央文革，最后宋任穷被迫以个人名义宣布收回“三点意见”。4月30日，沈阳军区撤走了东北局的警卫，并支持两个造反派组织进驻东北局。此后，各造反组织有的到东北局大院造反，有的上访，还有闲杂人员随意进来闲逛，人员车辆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宛如喧嚣的集市，东北局机关的日常工作随之陷于瘫痪。

这时候喻屏已经不能回家，他只能靠支持他的群众组织保护，住在东北工学院或辽宁省体校运动系。在书记处的成员中，宋任穷和欧阳钦已被周恩来调到北京保护起来，马明方和顾卓新由于被揪斗不便轻易露面，只有喻屏还能勉强出面，苦苦维持着书记处的工作。但喻屏此时的处境，已是举步维艰。白云涛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喻屏同志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打倒一切”的倒行逆施有着切肤之痛。他对

打倒彭、陆、罗、杨，打倒刘、邓、陶，打倒中央一批老师，感到十分困惑，对党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特别是对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他心急如焚，预感到会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灾难。他曾想直接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但一直苦于找不到传递的方法，没有通往上面的渠道。对眼睁睁看到武斗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他痛心疾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面对如此严重局面而无能为力，他感到十分痛楚，常常为此而长夜不眠。当时他连家都回不了，只能去说服保护他的那一群群众组织不要动武。“只可文攻”，“不可武斗”。决不能去搞“打砸抢”。他曾叫我去找一派组织的头头，向他们明确表明：我们不赞成打砸抢，不能搞武斗。

徐其成是省体校运动系的高级武术教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负责保护喻屏和其他几位老干部。他回忆说：

“这些老干部都是建立新中国的国家栋梁，如果把他们都否定了，就等于否定了新中国。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保护了这批老干部。在这些老干部中，我和喻屏接触较多。”“当辽宁地区武斗升级时，喻屏同志对我们说：‘我们不能武斗。毛主席早就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大家都是革命群众，互相武斗是不对的’。”

但是，大规模的武斗还是终于发生了，这就是当时震惊辽沈的“六一”事件。这场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剧，完全是预谋、有计划地进行的。1979年8月，辽宁省“两案办公室”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清查，以下便是经过清查的事实真相：

1967年5月27日，“辽革站”召集会议，研究攻打设在东北工学院的“辽联”总部，揪斗马明方。军代表徐某、战某参加了这次会议。5月31日晚，“辽革站”总部头头张某、谷某向军代表徐某汇报攻打“辽联”总部的准备情况，并问徐某：这样去行吗？徐某说：怎么不行。张某又问：这些当权派是否真在“东工”？徐某说：这个你不要怀疑，今天中午还有人看见了喻屏，有变化一定告诉你们。这次夜袭东北工学院“辽联”总部的具体部署是：“辽革站”三七联总围攻东北工学院、省体校运动系；黎明联总主攻老干部住的大楼，抓老干部；“金铁”带武斗队去砸总电门，灯灭为号；化工联委负责牵制辽宁大学；装具系统围

攻二宿舍；铁路系统守南湖大桥。6月1日凌晨三时，“辽革站”聚集两千多人围攻东北工学院“辽联”总部。当主攻大楼的武斗队攻进大楼时，却发现楼内空无一人。这时，“辽联”组织的武斗小分队隐藏在暗处，待“辽革站”的队伍攻入院内后，便出其不意地从背后进行突然袭击。“辽革站”的队伍顿时大乱，前线总指挥张某、李某当场被俘，兰继英被打死，另外还有多人受伤。当天夜里，马明方、喻屏、徐少甫（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住在省体校运动系的平房里，当他们听到响动后，便机警地躲进天棚内，因而得以幸免。

事件发生后，喻屏邀集记者谈话，利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严正指出，这是一场“大规模武斗”，并对此严加痛斥。同时，他对军区“接待站”支持“六一”事件，表示极大遗憾和惋惜。

然而，“辽革站”的那些造反派却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真相，大肆宣扬：喻屏是这次“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的阴谋策划者和刽子手”。他们在《喻屏十大罪状》中写道：“他不仅大力宣传武斗，而且还亲自组织和指挥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残酷的‘六一’血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喻屏！”“他不仅煽阴风，指示暴徒疯狂镇压革命派，而且竟妄想把武斗的责任强加在军区头上，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可忍，孰不可忍！”喻屏“必须加倍偿还血债！”

此后，东北局书记处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实际上已无法继续工作。喻屏只好把原在东北局给他作秘书的孙国明邀到东北工学院，请他和白云涛帮助自己写检查，检讨多年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错误。

8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决定停止东北局工作。

8月21日，沈阳军区传达周恩来指示：辽宁三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喻屏以及徐少甫、张正德、莫文祥、李国华、王堃骋等省市领导干部，务必于8月23日到京开会，解决辽宁问题。

据喻屏回忆：8月22日下午5时许，喻屏和徐少甫、张正德、莫文祥以及“辽联”的代表到达东塔机场，他们在候机室稍事休息，便登上班机。在机舱内，他看到王堃骋、李国华已坐在舱内。喻屏等人在机舱内刚刚坐定，忽听枪声大作，“辽联”的一个代表顿时受伤，莫文祥让大家赶快趴下。过一会儿，他们接连走下飞机，赶到南面的草坪中隐蔽起来。这时，“辽革站”的武斗队仍在向飞机射

击、扫射，叫喊捉拿徐少甫。直到机场里的枪声完全平静下来，机场的工作人员才把喻屏等人带到机场的东北角休息，并告诉他们，飞机已被打坏，不能起飞，目前只有一架安二小飞机，但不能长途飞行。于是，喻屏等人决定，乘坐这架安二前往鞍山，然后从鞍山乘大飞机赶往北京。

这场被称作“八二二东塔机场事件”的大规模武斗，共打坏飞机两架，有三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死，十五名战士被打伤。此外，还有“辽联”一名代表受伤，在机场执行任务的一位军代表五处负伤。

8月23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吴法宪等有关领导人接见辽宁三派代表及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干部。吴法宪在会上讲了沈阳军区和沈阳空军于23日凌晨发出的特急电的内容。这两份特急电隐瞒了事实真相，谎报徐少甫指挥“辽联”袭击机场，打死打伤十八名解放军战士。康生听后，当即把徐少甫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顿。与会的“辽联”代表，对此当场进行了反驳。此时，周恩来指示：沈阳军区党委再查一查。9月7日，沈阳军区在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仍称：8月23日的电报报告属实。

1979年8月，辽宁省“两案办公室”对“八二二东塔机场事件”进行了清查。事实表明，这一大规模的残酷的流血事件，是由军区支持的“辽革站”及“黎明联总”组织、策划的。

当时，东塔地区的几个大型军工厂，都是由军管会管理，但黎明厂和星光厂的“辽革站”派却都有火力强大的武斗队。1967年8月22日17时40分，“辽联”派三十余人，携带四支半自动步枪、六支手枪，将赴京的“辽联”代表和喻屏、徐少甫、张正德、莫文祥等护送到机场。与此同时，属“辽革站”派的“黎明联总”的头头高某，采用围点（机场）打援战术，一面派孙某带领一支武斗队到机场去抓徐少甫；一面派林某带领武斗队携带机枪、半自动步枪在滂江桥附近设伏，准备伏击“辽联”的增援人员。18时17分，当“辽联”的护送人员正在候机楼前欢送时，“辽革站”的孙某带领一伙人端着冲锋枪、自动步枪冲进机场，一面叫喊捉拿徐少甫；一面向候机楼和飞机射击。“辽联”的护送人员，立即躲进候机楼还击。20时40分，沈阳军区空军作战处副处长宋某率六十一名解放军战士，分乘两辆汽车前往机场制止武斗。当汽车行驶到滂江桥时，立即遭到林某带领的武斗队的伏击。当场打死解放军战士两人（三天后在医院又死一人），打

伤战士十五人。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当即向伏击的武斗队喊话：我们是解放军！设伏的林某一伙停止射击后，两名解放军干部走到伏击阵地询问：你们是哪的？伏击的人说：我们是“黎明联总”的。两个解放军干部不禁啊了一声：是“黎明联总”的！事件发生后，驻黎明厂的军管会主任把带队打死打伤解放军的林某等人找去，训斥一顿。8月27日，“辽革站”和“黎明联总”就他们22日晚伏击解放军一事，分别向军区写了检讨报告。事实已充分证明，22日伏击打死打伤解放军的罪魁祸首，是“辽革站”和隶属于“辽革站”的“黎明联总”。但沈阳军区和沈阳空军9月7日在给中央的《关于8月22日东塔机场事件调查报告》中，仍继续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央，谎称：8月23日的电报属实。

这样，徐少甫便继续被诬陷为这一大规模流血事件的直接指挥者。而喻屏则被诬蔑为“反对人民解放军”，“掀起反军区黑风”的幕后策划者。

喻屏到京不久，便参加“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这个为“解决辽宁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批判会，最后竟演变为对喻屏等人的残酷批斗会。喻屏回忆说：

随后，我们就住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由陈锡联主持。当时，凡是“辽联”谈的情况，记录的人一点不记，“辽革站”谈的情况，他就全都记录下来。这就说明他们有偏见。会上，“辽革站”的代表发言，对我进行批判。以后就不准支持“辽联”这边的领导同志讲话，整了我们几个月，把我们从京西宾馆赶到西苑饭店，秘书也打发回沈阳。接着就批斗我们，开始是批斗我，过一段就批斗宋任穷。

……10月29日，喻屏在会议上作了“个人对大联合的意见”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来京前有两三个月，除了接待外地来访者了解过去熟人的情况，或写书面材料外，主要是集中精力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写检查材料，接受群众的炮轰、批判。到京后两个多月，也是结合学习主席著作检查自己的错误。现在已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未接触群众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了。对大联合问题，只能提出一些粗浅意见作参考。”辽宁、沈阳的“革命派大联合，是由军区直接抓，直接领导的。军区采取什么措施，对大联合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这些人现在不在家，即使回去，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也只能向群众作检查，是很难起作用的。

徐（少甫）、莫（文祥）、张（正德）情况虽有不同，但发言权也不大。为了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协调军区和三大派的关系，是一个极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根据我过去的了解，‘辽革站’对军区支左工作是很满意的，和军区的关系是好的，‘辽革站’是听军区同志的话的。”但是“‘辽联’、‘八三一’及与其同观点的组织，和军区的关系是紧张的，对立是严重的。”“根据我过去的了解，‘辽联’、‘八三一’及和其同观点的组织，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是很多的，主要是认为军区的支左工作是支保压左。我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我一直认为是认识问题，和地方不同，没有保自己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沈阳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沈阳革命大联合就比较好办了。军区在沈阳的支左工作，究竟是否支保压左，分歧很大。弄清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走群众路线，首先建议军区同志系统地听听‘辽联’、‘八三一’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对的采纳，有错误就改，就检查，不对的就说明解释。这次会上，军区的同志对支左工作都有检查，如果早向‘辽联’、‘八三一’群众进行检查，现在情况可能不同。我估计这样做，收效会很大，和军区的关系很快会缓和下来。据说，军区过去系统地听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是不多的，现在需要耐心地听听他们的意见。”

喻屏的这个发言，随即遭到李伯秋（时为沈阳军区副政委）等人蛮横的批驳。他们说：“我们犯错误，是压了错误多的造反派，或是成分不好的造反派——是否是造反派还值得研究，有的就是保守派。”“军队没有支持走资派、当权派，支持的组织都是革字当头的。有的造反派看不中；有的造反派组织中有保的组织；有的在学校中是造反派，走上社会就保了。”（喻屏参加“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笔记，1967年10月30日）接着，他们便组织东北三省的造反派对喻屏进行轮番批斗。这些造反派用坐“喷气式”、拳打脚踢、在饭店院子里游街等手段，逼迫喻屏承认“东北局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无论造反派怎样批斗，喻屏始终不承认“东北局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承认宋任穷是“东北地区的头号走资派”。当然，他也从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承认工作中有错误。

他们批斗了喻屏，又把宋任穷从京西宾馆揪到西苑饭店进行批斗。宋任穷在谈到此番惨遭批斗时，这样写道：

东北的造反派曾经把我从京西宾馆拉到西苑饭店，三个省轮番批斗。在批斗

会上都坐“喷气式”，左右两个人把我的胳膊使劲往后扳，把我的身体向下压得很低。每次批斗回去浑身疼痛，躺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还拉到西苑饭店的院子里游了街，用“喷气式”的姿势推着我走，几乎就是在地上爬。一次批斗时他们把一张方桌的桌面压在我的肩上。还有一次给我挂铁牌子，回家后发现脖子上勒出一条血印，连腰都直不起来。（《宋任穷回忆录》续集，第 17 页）

这个为“解决辽宁问题”而召集的“两级军区三级党委会议”，历时半年之久，最终竟以批斗喻屏、宋任穷而宣告结束。

1968 年 2 月上旬，陈锡联找喻屏谈话，对喻屏说：组织上认为你的历史问题，不像你自己说的那样。1943 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喻屏和陈锡联同在一部第三支部，而且分别担任党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在审干中，喻屏 1933 年 10 月在北平被捕、1934 年 4 月在南京被敌人判刑坐牢以及 1937 年 9 月被党营救出狱的这一段历史，已在中央党校经过严格审查。陈锡联对喻屏的这一段历史，原本是比较了解的。如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要把喻屏打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而且还要纠缠本身并不存在的所谓“历史问题”，这不能不使喻屏感到愤慨。因此，他态度极其强硬地对陈锡联说：“那就请组织上进行严格审查，一个疑点也不要遗漏，查得越彻底越好。”

3 月 28 日，喻屏被两名解放军干部押上北京至沈阳的列车。到达沈阳后，喻屏旋即被关押在东北局院内的一幢楼内，从此失去了自由。

5 月 10 日，辽宁省终于实现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社论说：“长期以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东北及辽宁地区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斩断了他们的黑手”，“终于取得了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喻屏就这样被公开点名，背负着无以复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被宣告打倒了！

节录自高振河著《喻屏传——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人生历程》第十三章“十年劫难”，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该书由宋平题写书名，宋任穷、张爱萍题词，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 8 月出版。

---

【文摘】

### 47 军走访组回湘汇报座谈否定“文革”（节录）

李振祥

47 军在认真学习整党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为了深入进行否定“文革”教育，进一步消除“三支两军”的消极后果，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军区的指示精神，派军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宫永丰，率领军机关干部苟心权等同志组成走访组，代表军党委于 1985 年 3 月 9 日至 25 日间，专门走访了已经离开十五年、曾经负责过“三支两军”工作的湖南省。

通过走访，47 军清楚地看到了“支左”实际是支派，由于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举办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批斗所谓“走资派”中，部分支左人员的极“左”思想和过火行为，不仅伤害了一些老干部的身体，更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伤了他们的心。在“抓革命，促生产”中，积极推行了一些“左”的东西，干扰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有的支左人员，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以“军代表”自居，在生产业务上搞瞎指挥，使一些地区、部门的工作和生产受到了损失；极少数支左人员以权谋私、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声誉，破坏了军政、军民关系，等等。以上事实，使 47 军走访组确实看到“三支两军”工作给地方和军队建设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

节录自李振祥著《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纪实》，顾问黎原。湘新出准



字 ( 2004 ) 第 021 号 , 359—361 页。

---

【故纸堆】

[1967 年中央对青海、安徽、内蒙、福建等 12 省、区支左的批  
示  
\( 摘录 \)](#)

**青海**

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1967.03.24; 中发 [67] 110 号

**安徽**

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执行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做法。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1967.03.27；中发〔67〕112号

## 内蒙

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

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

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1967.04.13；中发〔67〕126号

## 福建

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

1967.04.30；中发〔67〕142号

## 四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廷、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

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中发 [67] 147 号

## 甘肃

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1967.08.04； 中发 [67] 230 号

## 云南

驻云南省的部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是支持了左派的。但是，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 error，虽然是支左中的错误，但是这是原则性、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责任主要在昆明军区，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

——中共中央批发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1967.08.08； 中发 [67] 237 号

## 湖南

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4 号

## 江西

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和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应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3 号

## 广东

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11.12； 中发 [67] 341 号

## 广西

中央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次，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

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1967.11.18； 中发 [67] 353 号

## 宁夏

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

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 8037 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1967.12.27； 中发 [67] 407 号

以上文件均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

## 【故纸堆】

### [四川省江油县支左部队转变立场的三个文件](#)

按：1967 年的春夏之交，许多地方的支左部队都面临作检讨和“转弯子”的困境。在 1967 年 2、3 月按毛泽东发布的“军委八条”及相关部署开展的“镇反”中，许多支左部队都打击、镇压了造反派。然而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从 3 月底开始又改变部署，发布“军委十条”及一系列文件、社论、讲话，要求给前一段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许多支左部队都不得不执行命令，转变立场，四川省因毛泽东批准于 5 月 7 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称“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

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各地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各地支左部队纷纷被迫转向，向自己原来认定的“反革命”组织表示支持并反过来压制、打击甚至瓦解自己原来认定的“左派”(保守派)组织。在本已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冲突中火上加油。由此，一些支左部队深陷于群众组织派性冲突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以后又不得不再次检讨“支一派压一派”、“武装镇压革命群众”的错误。

以下资料中提到的基建工程兵一支队,代号建字 01 部队,1966 年由冶金部下属建筑工程公司改建,当时正在江油承担三线建设大型项目长城钢厂的建设任务，与地方上关系较为密切。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命令

基建工程兵一支队、江油县武装部：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江油县连日来发生围攻革命造反派进行武斗，严刑拷打红卫兵，抓走 7812 部队前去执行任务的干部战士等一系列严重事件，是极不正常的，这完全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某些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干的。有迹象表明你部有的干部战士和所谓的“敢死队”混在一起，参予了这些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举世无双的革命军队，是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最能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我们相信，只要抓紧政治思想工作，参予上述活动的干部战士是会回头的。为使这些同志不致



在错误道路上越陷越深，特命令你们：

一、立即召集所属干部战士，重新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进行小型整风，检查前阶段支左工作中的问题。

二、严禁所属人员参予武斗和围攻革命造反派，不准把矛头指向 7812 前去执行任务的部队，和他们的意见分歧、通过协商解决。

三、说服双方停止武斗，释放被抓人员。首先要运用你们的影响，保证被某些群众组织抓走的 7812 部队干部战士、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人员的生命安全，保证他们不被严刑拷打，然后协商双方放人事宜。

望你们立即按照上述命令执行，若见效果以往可不追究。否则，要追究有关人员应负的责任。执行命令的情况，随时报告我们。

司令员 梁兴初

政治委员 张国华

甘渭汉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第〇一部队通告

为了更好地促进江油地区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前发展和更有效地贯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确保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抓革命，促生产，特通告如下：

一、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联合通告》，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命令。

二、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红卫兵江油部队，三〇二革命造反司令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江电纵队等革命组织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七八一二兄弟部队，搞好关系，加强团结，共同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三、热烈欢迎江油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对我部过去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帮助批评，我们一定坚决改正，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抽出得力干、战、职工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干部亲自带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处理武斗遗留的问题，希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予以协助和支持。

五、对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六条《重要通告》要求各革命组织与我部密切协作，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

### 最高指示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〇一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八一二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〇一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油县武装部

### 紧急通告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威风，江油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以所谓“敢死队”为核心的保守势力，在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挑起了多次武斗，制造了“五卅”等流血事件。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仍在造谣惑众，准备凶器，制造摩擦，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保证《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中央“中发（67）178号通令”的坚决贯彻执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严禁武斗，我中国人民解

放军江油驻军特发布紧急通告如下：

一、《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搞好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中央“中发（67）178号通令”（以下简称七条通令）是捍卫最高统帅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重大措施，表达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坚决贯彻、严格执行。

二、我江油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学习，广泛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央“七条通令”和有关文件，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互相监督，共同遵守。

三、各群众组织和个人都必须维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开展。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打群架。各群众组织和个人现有的枪弹、刀矛、匕首、钢钎、铁弹、棍棒等凶器，必须迅速全部收交，“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集中封存。今后，任何群众组织、单位或个人，均不得重新制造携带上述凶器，违者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

四、为保证《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七条通令”的彻底贯彻执行，严禁武斗，我江油驻军组成“江油地区制止武斗联合指挥部”，具体承办有关事宜，办公机关设建字01部队。指挥部有权调动部队组织巡逻、纠察，制止武斗，有权监督检查各群众组织对本通告的执行情况，有权处理挑起武斗者，以及打人凶手。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听从指挥，服从纠察，不得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执行任务的部队，违者必须查处。对江油地区“五卅”流血事件将做专案处理。对于这次案件的幕后策划者和杀人的凶手定予追究。

以上通告，自即日起，立即生效。

1967年6月30日

这三个文件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〇一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油县武装部翻印。由读者江挥录入、提供，谨致谢忱。

---

【故纸堆】

## [五十四军党委总结文革支左教训](#)

本报讯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重庆市进行过支“左”工作的某部党委，联系实际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最近，由党委负责同志带领走访组，专程来我市看望了当时受到冲击的部分老同志、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这个部队党委联系在重庆支“左”的实际，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的专题讨论。为了在思想上、感情上彻底否定“文革”，进一步搞好核查“三种人”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部队党委决定，由党委书记李九龙带队，来重庆听取地方老同志的意见。在三月十六日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李九龙同志首先介绍了部队党委进行的彻底否定“文革”教育的情况。他说，部队当时在重庆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搞所谓“大批判”，办所谓“集训队”、“管训队”，伤害了地方一些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搞“突出政治”那一套“左”的东西，给地方经济、文化建设造成了不良后果；个别“三支两军”人员，以权谋私，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代表部队党委向当时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表示歉意。

市委、市顾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以及一些部门、单位的老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三月十七日，李九龙等前往医院看望了孙先余，并到家中看望了段大明、鲁崇义和廖苏华同志的家属。

此文原载《重庆日报》1985年3月20日头版，原题为“‘文革’期间曾在重庆市支‘左’的某部党委专程来渝看望受迫害受冲击的老干部”。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

【闲读偶记】

## [对《许世友将军逸事》的几点补正](#)

[董国强](#)

《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上发表了李波先生《许世友将军逸事》一文，其中写道：

1966年秋，一代虎将许世友也处在危难之中。……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乘坐吉普车，从隐身住地，渡江北上，驶上浦镇北城圩某部视察。闻讯而来的军师首长们，见到被“炮轰”而东躲西藏久违了的司令员，个个心情激动，倍感亲切。他们相互搀扶着，在坎坷不平的田间小路上，指指点点，谈笑风生。那亲密无间的情景，令人非常感动。我也不失时机地按动着快门，拍下了不少动人的瞬间。

一次，当我站在他的面前，拍摄他的特写镜头时，将军可能听见相机快门的响声，笑着对我说：“怎么又是你这个小鬼？不要再拍了，说不定我还是个黑帮分子哩！”此话一出，顿时惊住了军师首长们。许世友语调平静地说：“我许世友倒不倒，要由毛主席发话！”数月后，周恩来总理在接待江苏省暨南京市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即《1·28讲话》），严厉批评说：“许世友打仗这样勇敢的人，都被你们撵得‘钻’了山洞，这是毁我长城啊！”难怪在此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许世友时，他“跪拜”毛主席，一诉衷肠。

根据笔者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李波先生上述回忆文字似乎存在若干重要史实错误，特此提出就教于李波先生。

第一，李文说“1966年秋许世友处于危难之中”，显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互抵牾。

就笔者所知，江苏、南京地区的文革运动始于1966年6月初南京大学“六二事件”。此后江苏省委根据中央（当时由刘、邓主持工作）的指示，向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派出工作队，试图对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实施控制。不料到7月中下旬，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这个消息传到南大，学生运动的斗争矛头迅速由匡亚明和南大党委转向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为首的省委工作队，并进而指向江苏省委。8月上旬，因带头贴工作队大字报而遭受打压的南大青年教师文凤来潜赴北京告状，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文凤来参加“八一八”接见后载誉归来，南京地区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派”于

8月23日宣告成立。8月27日，另一个造反派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也宣告成立。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以后，很快与社会上的造反派势力结成广泛联盟，分别形成“江苏红总”和“南京八·二七”。鉴于中央曾经明确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应该军、地有别，所以从1966年8月下旬造反派组织出现，一直到1967年初“一·二六夺权”为止，江苏、南京地区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造反派与省委之间的矛盾冲突。

然而南京军区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7月份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组建的时候，南京军区曾根据《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派出大批干部参加工作队，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还担任了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不过在7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工作组问题作出批评以后，特别是10月6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群众大会上公开答复南大“八·二七”代表丁曰泗关于工作队错误的问题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开始与造反派进行秘密接触。在后来与“八·二七”领袖高啸平、曾邦元等人的一次谈话中，许世友亲口说过：“八·二七我也很了解，以前是通过解放军报记者与你们联系的。”（《促联战报》，1967年11月7日）许世友这里提到的《解放军报》记者是邢文举，他作为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派驻南京的联络员，在江苏、南京地区的“造反”、“夺权”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许世友、邢文举的支持下，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在1966年11月的一次南大师生揭批省委工作队的群众大会上反戈一击，公开揭露了工作队利用省、市公安机关收集、整理南大造反师生“黑材料”的内幕。此举使江苏省委和省委驻南大工作队陷于极大被动。关于“梁杜吴造反”的幕后详情，张春桥在1967年5月代表中央赴南京调处造反派与军方关系的时候说过：“……南京部队从老早，实际上不是现在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老早就介入了，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张春桥姚文元杜平对江苏和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讲话》，1967年5月14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

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其次，许世友还多次向中央揭发江苏省委的所谓“罪行”。在1967年9月《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即著名的《九·二八讲话》）中，康生说“许世友同志是一贯的反对江渭清的”。张春桥也说：“梁杜吴起来造反是他支持的嘛。那时候，他能站出来反对江渭清，支持梁杜吴是不容易的。”（《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9月28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在李文提到的那个《一·二八讲话》记录稿中，江青在赞扬许世友时也说过：“……去年（1967年，董注）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李士英，江苏省委书记处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董注），洪××（洪沛霖，江苏省公安厅长，董注），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月28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些讲话都可以折射许世友在文革初期的基本立场和现实处境。

再次，南京军区在1967年初江苏“一·二六夺权”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当年“红总”勤务组成员耿昌贤先生回忆：“1月26日那天的夺权活动我是自始至终参与的。‘夺权指挥部’设在南师。我当时负责两个事情：一个是负责跟南京军区联络，一个是负责筹备鼓楼广场的群众大会。与南京军区的接触，我找的是梁辑卿和邢文举。我是25号下午去的，在华东饭店AB大楼。见到他们以后，我就把我们准备夺权的情况汇报了，然后提出三个要求：第一是请军区公开表示支持；第二是请军区派部队保卫几个地方，包括‘夺权指挥部’所在地南师，省委、省人委和市委、市人委机关等；第三就是请军区领导出席鼓楼广场群众庆祝大会。我们谈过以后，梁辑卿就向南京军区许世友、杜平汇报，邢文举就向中央文革和总理汇报。在这之后，梁辑卿对我说：‘我们已经请示过了，你们提出的三个要求都可以满足，你回去吧，我们马上派军队维持秩序。’在回来的路上，我就看到南京军区的部队在调动部署。等到我回到南师的时候，大门口已经有解

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了。”（**笔者与耿昌贤先生谈话记录**，2007年1月31日）邢文举先生前不久发表的回忆录虽然否认他在夺权中的主导作用，却暗示南京军区事先知道造反派的夺权行动（**邢文举**：《**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老照片**》第五十九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6月）。而据某权威研究机构编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未刊稿**）记载：在1月26日“夺权”行动中，南京军区出动四个连、二十辆军用卡车、十二辆摩托车支持“夺权”。1月30日，“夺权委员会”在五台山体育场、人民广场等处召开“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誓师大会”，52个“造反派”组织、30万人参加。南京军区派出4000名指战员参加会议，军区副司令员饶子健在会上讲了话。

依据本文提供的上述种种事实，至少从1966年10月“梁杜吴造反”，到1967年1月“一·二六夺权”前后，南京军区与造反派组织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许世友对中央的指示精神亦步亦趋。毛泽东先后于1966年12月3日和1967年1月27日以中央名义批转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两份请示报告，对南京军区的立场和主张给予高度评价，全国范围的“支左”决策由此发轫。所以李波先生说“1966年秋许世友处于危难之中”，真不知从何说起？

第二，就笔者所知，许世友确实因与造反派的矛盾冲突一度“处于危难之中”，不过时间不是“1966年秋”，而是“1967年夏”。而且这次短暂的“历险”其实有惊无险。

许世友与造反派的矛盾冲突始于1967年3月。其背景是“一·二六夺权”以后，以文凤来为首的“红总”和以曾邦元为首的“八·二七”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两派的武斗不断升级，严重威胁到江苏的社会稳定和生产秩序。中央在通过协商方式实现“大联合”的尝试失败以后，于3月5日宣布对江苏实施“军管”。江苏的大权遂全部集中到南京军区手中。在“一·二六夺权”以后一度把持江苏大权的“红总”显然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于是江苏、南京地区的主要矛盾迅速转化为“红总”与军方的矛盾。军方根据中央《军委八条》等指示于3月间实施“镇反”，桀骜不驯的“红总”首当其冲，许多基层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另外有近千人被捕。如果不是中央于4月6日发布了一个《军委十条》，“红总”无疑将很快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然而到3月底，所谓“二月逆流”和青海“赵永夫事件”浮出水面。毛泽东似乎认为这两个事件是“走资派残余势力”试图利用军队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信号。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打退“走资派”的新反扑，毛泽东转而支持各地造反派与军方对抗。于是不但有了旨在削弱军方威权的《军委十条》，而且“两报一刊”在此前后又相继发表社论，呼吁“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江苏“红总”利用这个转机不断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军方的权威。南京军区则陷于被动，无所作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中央发出《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两报一刊”又相继发表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成为当时舆论宣传的主旋律，整个局势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军方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红总”遂于8月间在江苏、南京地区策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揪许”运动，公开提出“打倒许大马棒！”的口号。而一向与“红总”对立、持“拥军”立场的“八·二七”，也在主流舆论宣传的误导下发生涣散，一些下属组织居然跟在“红总”后面摇旗呐喊。许世友和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的家被造反派查抄，许多军区首长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处于危难之中”的许世友先是前往27军（其前身是许世友亲任指挥员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华野“九纵”）军部所在地无锡避难，不久以后又转往安徽大别山深处的军事要塞。

8月中旬，蛰居上海的毛泽东洞观全局，对“武汉事件”和南京“揪许”风潮有了新的看法，意识到“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遂于8月18日派张春桥乘专机前往安徽将许世友接到上海，当面告诉许世友可以回到南京去向有关方面传达“三个就说”：一、就说“红太阳”在上海接见了你；二、就说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稳定；三、就说毛主席说不准揪许世友。（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二）》，党史纵横，2002年第12期）此后，毛泽东又于8月25日发出“拥军爱民”的号召。周恩来、张春桥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打电话给“八·二七”和“红总”方面。在中央的强力干预下，南京造反派的“揪许”运动不得不于9月初黯然收场。随后中央将南京军区、江苏省军管会、“红总”、“八·二七”等方面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谈判。与此同时，周恩来奉毛泽东的指示，派专机将“称病休养”的许世友接到北京中南海居住。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在京高干，许世友跻身其间，公开“亮相”。此举再一次向外界表明了毛泽东对许世友的态度。

以上背景大概可以作为“我许世友倒不倒，要由毛主席发话”一语的注脚。

第三，就笔者所知，1967年10月江苏各方代表到北京以后，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向大家传达过毛泽东关于许世友问题的指示，目前有案可查的公开讲话包括：（1）、1967年9月28日康生、张春桥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2）、11月4日张春桥在江苏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3）、11月18日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4）、12月5日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5）、12月14日周恩来、康生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6）、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即李文提及的《一·二八讲话》）。

由此可见，李文提到的《一·二八讲话》，不是发生在“1966年秋”的“数月后”，而是发生在“1967年夏”的“数月后”。而且李文中所引的那段话不是周恩来说的，或者不是周恩来在《一·二八讲话》中说的。在《一·二八讲话》记录稿中，类似的一段话出于江青之口，其原话如下：“……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的人，被揪得钻工事……”（《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8年1月28日）

---

【蓦然回首】

## 军宣队与山西省歌舞剧院

愚 人

### 一、支左众生相

我也曾是军人。1947年我13岁的时候，就以杂技演员的身份入伍。最初是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剧社的社长就是写《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傅铎。不久，我转到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卫生部（部长钱正英）宣传队，

做小提琴演奏员。1950年卫生部宣传队解散，我被分到了绥远军区的36军文工团，还是拉小提琴。1951年去朝鲜演出。1952年回国。36军文工团撤销后，我到了后来改为建筑工程部队的106师。1955年，我们文工团集体转业到山西大同。山西省为了留住我们，特意成立了山西省歌舞二团。因为一个省养两个歌舞团不合适，1956年省里把二团与一团合并成了山西省歌舞剧院。

歌舞剧院位于太原市并州路，全院最多编制时是170多人，分舞蹈队、歌剧队、管弦乐队、舞台美术队和团部直属的艺术室（作曲家，剧作家，乐队指挥，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阎维文，舞蹈编导张继刚，民歌手刘改鱼等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我到剧院时刚刚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剧院领导对我挺重视，除了让我干老本行，当小提琴演奏员之外，还委任我当乐队副队长。

那时，歌舞剧院的支部书记是杨路，院长是张建。剧院很多人都对张建有看法，认为他拉帮结派，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62年调工资，张建对一些老同志说：我们受党多年教育，有相当的觉悟了，在荣誉与金钱面前，当然我们选择党性。就我们的级别、工资而论，比年轻同志高了许多，他们只有40多块钱，如果我们一个老同志不提这一级，就能给三个年轻同志提级，我们单位提级的百分比就会大大地突破，而工资额不长。经他这么一说，许多老同志放弃了提级，让给了年轻人。这样一来，年轻人被他拉了过去，而张建和他一伙的几个高级别者却都提了工资，一跃成了厅局级干部。许多老同志给他提意见，他就打击报复，企图把一些老同打成“反党集团”（这些老同志绝大多数是党员）。只是因为文化厅的干预，张建设没能得逞。

文革发动时，张建带着歌剧队在晋南搞四清、杨路领导运动。因为上述原因，张建成了众矢之的。给他贴的大字报像狂风暴雨，呼啸而来。杨路一来为形势所迫，二来遵循“放手发动群众”的上级指示。在文化厅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那年我31岁，一个心眼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被选进了领导班子。而就在这时，另一种观点的暗流已经在剧院涌动。此后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基本观点就是保张建，另一派“11.28”则以保杨路为职志。尽管两派对此都不承认，但其根本分歧端在乎此。

作为领导班子中的一员，我自然被划归杨路一派。而几个月后，毛泽东说，

前一段运动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人们就起来造反，因为我和杨路一起执行了“资反路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东方红”的打击对象。以侯桂林、张占明为首的“11.28”，成员年纪较大，党员的人数也多，对我执行的“资反路线”，给予了理解和原谅。当时我如果反戈一击，批判杨路，那么“东方红”就会放我一马。可是我死不认错，在“东方红”眼里，我就成了死保杨路的顽固分子，成了必须打倒的人物。

在两派极为对立之时，“东方红”和“11.28”各自和社会的一派串连起来。“11.28”靠向了以杨承孝为头头的“山西省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后来杨承孝被枪毙），“东方红”靠向以郝廷云为头头的“山西省红色造反联络总站”（后来郝廷云被判无期徒刑）。这两派工人组织，对待旧省委的态度是一致的，都参加了1967年1月的夺权。他们对山西文艺界的问题根本不了解，在观点上又有很大分歧，但是对文艺界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约而同地跑到文艺界拉帮结派，以便扩大势力，使之帐下有一个演出团体，为其派性服务。而“11.28”和“东方红”恰恰也正需要一个工人组织做后盾，于是，二者一拍即合。

有了社会上的两大派做靠山，“东方红”和“11.28”成了山西文艺界最著名的两派，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一心想把对方吃掉。“回原单位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等等指示、命令、要求，对山西歌舞剧院根本不起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山西省革委会决定向歌舞剧院派驻军宣队。

歌舞剧院共进驻过三批军宣队。第一批在1969年夏末进驻，共三个人，一名指导员带着两名战士。他们的任务是促成两派头头坐到一起，实现大联合。这三名军代表，虽然职务不高，但人家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的，是在高呼“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形势下进驻剧院的。所以两派都不敢慢待，都使出全身解数，争取军宣队的支持。怎么才能获得人家的支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给他们灌输自己一派的观点。无非是自己这一派如何受到打击，如何造反等等。两名战士则深入两派群众中了解情况。三位军代表成了全团最忙碌的人，有时吃饭也是边听边吃。

两派的群众和头头清楚，哪一派得到军宣队的支持，就会被列入左派的行列，在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时，就能把自己所保护的干部结合到新的领导班子里。可是，军代表在两派中间不偏不倚，于是引起“东方红”的不满，说军宣队“支

左”态度不明朗，对立情绪再次出现，革命的大联合泡了汤。

1969年搞“备战”，全院一起拉练到了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在那里搞阶级教育。过了几个月，第一批军宣队撤了，听说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1970年5月左右，第二批军宣队进驻歌舞剧院，同时和军宣来的还有工宣队，他们的任务仍然是促进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这批军宣队来自北京军区政治部和69军，其中还有战友文工团我认识的人，可在那个时候，认识也装作不认识，他不敢和我说话，我也不能和他接触。

这批军代表，职务都比较高，最低也是营级干部。可能是接受了第一批军宣队教训的缘故，从进歌舞剧院的那天起，对谁都是横眉冷对，在他们眼里，“洪洞县没好人”，好像到处是阶级敌人。表面看，他们似乎是一碗水端平，对两派的态度都一样，实际上是戴着框框来的。

这批军宣队进驻以后，“11.28”头头们多次找军代表谈剧院情况，可每次都遭到拒绝。而军代表对“东方红”的头头们却有说有笑。有时军代表在会上讲话，也能听出他们对老党员，老同志们的反感，几乎和张建的论调如出一辙。这也难怪，“11.28”的支持者们，老同志居多，而在老同志中，“历史有问题”的人也较多。清理阶级队伍一来，这些同志就成了牺牲品。歌舞剧院揪出来的所谓的阶级敌人，支持“11.28”观点的居多。这对于“11.28”来说是不小的压力。

在这批军宣队的治理下，歌舞剧院几乎成了监狱，“11.28”一派的个个成了囚犯，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业务不让搞，客人不让见，美其名曰防止串联。整天就是开会，不是批斗会，就是消除派性会，揭发检举会，促进大联合三结合的会，小会大会，没完没了。每次通知开大会，我的心里总是发颤，惟恐在哪个会上把我揪出来。

自批判“资反路线”以后，，我一直在外逃亡。当时“11.28”一派同情我，但不敢要我，也不敢为我辩护。“东方红”一派随时要抓我，正在我孤独无援之际，我的一位“右派”朋友张步法，帮我逃到了太原市供电局变电所。这里是“非本所人员不得入内”、更不能冲击的单位。我在这里躲避了几个月。

由于军宣队进驻，形势逼人，我不能不回，也不敢不回。回来之后，每天都是战战兢兢过日子，看到新的“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揪头发，扭胳膊，弯腰低头，我就感到一阵紧张。

这天又开批斗会，每人一个小马扎，按班组的位置，整齐排队进入排练室，坐到应坐的地方，空气像凝固了似的鸦雀无声，就连咳嗽声都会把人吓一跳。墙壁上贴着各样标语：“某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群众专政就是好”，“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等等。工宣队和军宣队，分站在标语的下方，盯着头也不敢抬的我们，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现敌情似的。

军代表一宣布开会，群众专政的头头就大喝一声：“把右派分子张步法押上来！”我心一颤。张步法跟我私交甚笃。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他表现得很积极，有人说他跳得高，企图不良，想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翻案，就这样把他揪出来了。正想着，只见几个人，按脑袋、扭胳膊，连推带搯地把张步法弄到大家面前，低头弯腰。我一看，张步法把头发剃得溜光，专政人员没法揪他的头发，只好抓着他的衣领。后来他对我说：“每次批斗，老子的头发都让他们揪掉好多，军宣队一来，我就把头发剃光，叫你们龟孙子还揪！”

批斗大会结束，无论老弱病残，所有挨批的，都得跪在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大跪请罪。直到广大群众退场后，吃完中午饭，他们才能起来。这时候，有的人已经直不起腰了。

搞这些变相体罚，肉体和精神折磨，表面看是工宣队的人在干，可实际上，军宣队是在幕后摇羽毛扇者。他们整天在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批斗场合，他们看见装没看见，这可能也是“阶级本能”吧。

有一天午饭后，大家刚要休息，一阵尖锐的哨声，把人们惊起。大伙赶紧到排练室紧急集合。一名军代表声色俱厉地宣布：“阶级敌人就是要破坏解放军支左！”人群里马上响起了口号声：“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军代表继续说，“我在吃饭前把暖瓶提进茶炉房，灌满水，等吃完饭提暖瓶时，瓶盖却滚在地上，沾上许多灰渣。这不是阶级敌人破坏是什么？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家要提高警惕，把这个阶级敌人揪出来！”

我听了暗笑：瓶盖被开水蒸汽冲掉是常事，连这么点常识也没有！

这件事在军工宣队内部可能引起分歧，以后再没提了。而这第二批军宣队不久也就离开了。

1971年春，第三批军宣队进驻歌舞剧院。这批军宣队只有两个人，一名姓何，是个副团级干部；一名姓吴，是个营级干部。这时我们剧院两派，在上一届

军宣队的强制下，已初步联合，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但两派对革命领导干部的看法仍有分歧，于是军代表就替代了革命领导干部，被结合成了第一把手。其他领导成员是两派选出来的头头。表面看，他们可以坐到一起开会，研究问题，骨子里派性仍很严重。军宣队认为：由于派性的保护，真正的坏头头还没有抓出来，如果我和侯桂林（党员）这样的坏头头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他们支左的目的就没能达到。几个月后，在山西省文化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习惯上称“太谷学习班”），我和侯桂林先后被揪了出来，这是后话。

第三批军宣队的两名军代表在对待剧院的策略、方法上大不相同，何代表对两派群众搞怀柔战术，最大限度地孤立所谓的坏头头，时不时地在群众面前宣称把一碗水端平，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他的小九九是，以后脱军装留在本院。吴代表则态度强硬，对谁都是一副冷面孔。对他来说，到这儿支左只是当一回过客，脱了军装就回家。

值得一说的是，何代表对美女们更加亲近，经常在女士（特别是美女）面前有说有笑，目光四射，似乎有普遍培育，重点开花的意思。我们知道他已有妻室，就故意问他：“何化同志，怎么不把老婆接来住住？”一听这话，他就支支吾吾，搪塞过去。

某天晚上 10 点多，邻屋的小郭夫妻把我叫到他们屋，对我悄悄说，你听听何代表和某某女在干什么。这房间下面就是何代表的房间，白天如果敞开窗户，说话声音大些就能听到。小郭指指床，要我贴近床腿、通过床腿的传导，听下面的声音。我照办了，果然听到了非常清晰的男女对话：

女：别大声说话，外面人能听见。

男：不怕。大家都睡觉了。这是牛肉。吃吧。

女：你再喝点酒。

然后是一阵笑声……

我不再听了。说实在话，我对男女的苟且不感兴趣。可是在那个年代，津津乐道的是用男女关系把人搞臭。当下是一位支左的军人，他有三点红，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样的行为不就是亵渎了二位领袖吗？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两派的群众对文革的一切，似有了点上当受骗的意识，不愿意不明不白地去被人利用，对军宣队态度，也由热情转变为冷淡。何、吴二

人也留不住了，他们要撤，有人提议要搞欢送会，有人反对，最后决定和军代表合影留念。当通知到我时，我冷冷地说，谁想和他们照就去照，我不去——跟他们合影是我的耻辱，我不想留这种纪念！

有关解放军支左时的丑闻很多，太原大众机械厂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厂就发生了这样的丑事：解放军进厂时，每人一个背包，一个语录牌，一本《毛主席语录》。等他们出厂时却是用大卡车往外拉东西。大衣柜，小衣柜，写字台、木材等等。不料出厂门时，被门卫老工人拦住，要他们出示物资出厂手续，这时的军宣队领导非常尴尬，既拿不出物资出厂单，又讲不出道理，由于这样纠缠，厂门口围观的人越聚越多，纷纷议论，支持老工人的做法。这位老工人对军宣队说，规章制度是你们定的，我现在就是按你们要求办。有围观者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可好，整车的往外拉东西！这时工厂保卫干部来解围，折衷地对老工人说，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们，先让他们走。老工人说，我认条不认人，这是他们教育我的。这时围观的人群中，有起哄的，有说怪话的，你一言我一语，弄得军代表们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后来只有革委会主任出面说，东西先留下，解放军先撤。此时围观的人才一轰而散。

由于解放军的“支左”。他们的高大形象已荡然无存。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军队这么拉一派打一派，政策水平这么低，作风这么不正，打起仗来，我反正不会去抢救伤员。

## 二、太谷学习班

军宣队从1969年派驻山西省文艺界，到了1970年秋，一年多了，还是没能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目标。两派之间貌合神离，所谓的革命领导干部没有进入领导班子，与社会组织没有彻底脱离联系。军宣队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坏头头没有抓出来造成的。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更严厉的措施：把文艺界的几个演出团体，调出太原市，实行封闭式的清查。这就是以后我们惯称的“太谷学习班”。

1970年秋，山西省文化局所属的歌舞剧院两派，山西省京剧院两派，山西省晋剧院两派，在几天之内离开了太原市，到了太谷县的省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集中办学习班。这个学院距离太原市大约60公里，是国内著名的农业专业院校之一。我们到来时，这里的教职员工、学生都不知去向，留下来的只有几



个看守人员。教室、实验室都上了锁，满院荒芜，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校园。

我们三个演出单位，在文化局军宣队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单位军代表的带领下，住进了这座空荡荡的大院，占用了整整一座三层的学生宿舍。军宣队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早出操，晚点名。并且定下了“七不准”：一、不准出大门，二、不经批准不得打电话，三、不准会客，四、不准串连，五、不准三人同行，六、不准通信，七、不准请假、探亲。每天的行动范围就是宿舍、操场、食堂、会场这四个地方。就连食堂也严格地划分区域，各单位不能混坐，以防互相交谈。我们从此与外界隔绝，成了变相囚犯，而这所学院则成了一座大监狱。

歌舞剧院和京剧院同住在一层楼，为了防止串连，在中间区域设置了可靠人值班，不让越界，双方人员，在楼道里见了面，只能点点头，连问安问好也不允许。

每间宿舍住六个人，两派各三人，分睡上下铺，以达到互相监督，互相举报的目的。我的上铺是“东方红”的张耀中，按说我和他有着不同观点，而且从文革初期就出现了严重对立，三、四年来，就没说过话，可是在这种环境下，对几年的运动，似乎都有了心照不宣的逆反心理，对没完没了的内斗有了厌烦情绪。

他有一台全院惟一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晚上熄灯后，他就把收音机拧开，听广播，当然我们也跟着沾光。但不知何故，有一天早晨出操回来，军代表突然找我谈话，让我揭发张耀中偷听敌台的事。我知道，这可不是小事，是现行反革命的严重问题，如真的查有此事，起码要判几年徒刑。我俩是两派，军代表为什么找我揭发他的问题？是利用派性矛盾，把问题揭出来？还是想陷我于诬陷罪？我想了想对军代表说，我们住同一个房间，未发现他偷听敌台（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没有耳机设置），如果他听敌台，我们都会听到，你们最好再问问别人。

此事以后再没有纠缠。

“11.28”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侯桂林被隔离审查，这对我来说是个警告，因为运动初期我俩就鳐在一起和前院长干。再往前推，1963年张建就想把我和侯桂林等四人打成反党小集团，由于文化局的干预，张建才没得逞。现在侯桂林被揪出来，我预感到灾难离我也不远了。

果然，几天后一个早晨，我出了宿舍，楼道里铺天盖地的大字，都是贴给我的。这些大字报，不是批判我执行资反路线，也不是批我和侯桂林的关系，而是

说我“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光宇的罪行必须清算”，说我“毁我长城罪该万死”，说我“反对林副主席”，并发誓叫我“狗头落地”。当时我就懵了，我没想到，我和张光宇的关系，会被人家上纲上线到这种地步。

张光宇是空军文工团歌剧团的一名主要演员，高高的身材，出身于工人家庭，可以说是苗红根正的好军人。他的妻子谢静珊是我院舞蹈演员，二人青梅竹马，因谢的出身不好离开了空军文工团，可是二人感情在全院也是独一无二。每次张光宇从北京到太原探亲，只要是逢我院演出，张光宇总是和我们一起装台卸台，搬箱倒柜。因我和张光宇都是军人出身，自认识后，我们的关系就很融洽。文革中，张光宇成了空军文工团一派的头头，当时军内两个司令部并不明显，张光宇这一派给吴法宪贴了不少大字报。空军文工团的另一派则是死保吴法宪。不知在军委谁的支持下，把张光宇这一派打成反动组织，于是到处抓张光宇。张光宇无处躲藏，我在北京正好有一处空房，我就把他藏在那里。后来，吴法宪得了势，张光宇就成了军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军通缉，后来终于从我在北京的家里把他抓走，判了死刑。念其出身好，一贯表现积极，改判无期。不管死刑还是无期，我都是窝藏和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人。张光宇的妻子谢静珊，迫于形势和政治压力，不得不与张光宇离婚。

如果只是泛泛地检举我包庇张光宇，我并不担心。因为事实不是大字报写的那样，我最担心的是和谢静珊的一次谈话，一旦谢静珊把这次谈话举报出来，两个问题并在一起，问题就严重了。

那还是 1970 年，第二批军宣队进驻不久，听说张光宇抓起来判了徒刑，又听说谢静珊在重重压力下准备和张光宇离婚。一天我约谢静珊见面，时间定在某日的深夜，在二、三楼的楼梯口。她如时到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悄悄问她，你怎么想和张光宇离婚？她说，我的压力太大了，祖父是国民党右派，父亲是反革命被镇压了，张光宇又成了现行反革命……说着说着，她就抽泣起来：“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你是体会不到的。”我问她：“你想用行动表现争取入党？还是想当官？”。她说，你别拿我开心了，像我这样怎么能入党当官？后来我劝她沉住气，慎重考虑，最好不要离婚，否则张光宇的压力比你更大。

这次极秘密的谈话，只有我俩知道，我当时对她说，今天的事，你知我知。说完就各回宿舍了。

和谢静珊的这次谈话，一旦和窝藏张光宇的问题联系起来，就严重了。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包庇反革命，劝阻别人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都是反革命罪行。

在这次追查我的问题时，尚没有牵涉到我和谢静珊谈话的内容，虽然这样，我必须要有两手准备，预防谢静珊顶不住压力时揭发我，我只有一口咬死“没有的事”，反正就我和谢俩人，没有别人知道。

追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人举报我参加了“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反革命组织。其实这是1967年3、4月份的事，当时我在太原供电局躲避批斗，一天，供电局负责我生活的小戴听说五一广场要召开“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联络站”成立大会，问我想不想去听听，并说陪我去。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憋了一两个月了，想出去转转，这样，两名工人陪着我到了五一广场，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转了转，看了看，觉得没意思，就回了供电局，这就演变为我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现在把这些捕风捉影的问题都揭出来，许多不了解真相的人，还真以为我既窝藏反革分子，又参加了揪军内一小撮，那我就真的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有些人虽和我的观点一样，这时也和我疏远起来，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敢打一下。想找个人聊聊也遭冷眼，不过比起侯桂林来，我算是好的，起码没有被隔离审查。可我也深深感到，现在的人怎么都没了思想呢？只要领导说什么，大家就一窝蜂地跟上，不管对错，一事当前，先保自己。

我憋得太难受了，一天晚饭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硬着头皮叫住了王宝灿，问他能不能跟我一起走走，他也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我想跟他谈谈有关张光宇的事，哪知他根本不想听，只说些开导我的话，讲些一般道里。后来我说，他们一定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豁出去了，党籍、资历全不要了，我就彻底堕落。我说的堕落，就是和他们干到底，听了我说的这些话，他又是一番劝导。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宿舍楼一看，一批新的大字报贴满了楼道，大部份是针对我这一小时的活动，有人质问我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有人写道，想找同情人，是痴心妄想，有人警告我，只有老实交代，否则是死路一条。

这时我才想到，原来一直有人在跟踪我，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他们订的约法七章中不准三人同行，现在我们二人走走也成了“搞阴谋诡计”。

对我揭发批判进行到第二阶段，即大小会相结合，个别谈话与群众见面相结合，软硬兼施的阶段。后来我得知，自到太谷学习班后，我一直是军宣队领导

者们眼中的重点对象，只是他们一直没有触动我，按他们的计划和步骤，先动谁，再动谁，内查外调怎么进行，现在可能是动我的时候到了，所以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以致跟踪监视也有专人负责。

在和群众见面的会上，没有让我坐“喷气式”，只是安排了不同的人对我检举、揭发、批判，让我交代和张光宇的关系及参加“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等问题。我一一作了说明，于是说我态度不好，人格侮辱，破口大骂一齐都来了，弄得我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会后，军代表找我谈话，很温和地劝导我，会上不好说的可以会下说，只要把问题说明白就行了。我对军代表说，我确实是让张光宇住到我家，他也是在我家被抓走的，可那时我不知道张就是反革命，更不知道吴法宪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我说，我跟本不会参加什么这方面的活动。军代表不相信我说的，让我老实地考虑交代问题，不要和群众对立。

对我的批斗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大约是9月底，突然通知我参加党员大会，听保密报告。礼堂的四周戒备森严，各单位所有的人保干部，都集中在礼堂的入口处，确认是不是自己单位的党员，部分军代表，在礼堂外围巡逻，似乎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排在队伍里，顺序进入礼堂就坐，主席台上就坐的全是军代表，看着他们个个一脸的严肃，大家也跟着紧张起来，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大会宣布开始后，军代表似乎还有点担心，怕走漏了风声，他看了看四周的门窗，觉得万无一失才说话。正式念文件前，他强调说，这是一份党中央的绝密文件，只传达到我们这一级党员同志，大家要严格保密，无论谁泄露出去要受到党纪处分（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没恢复党籍）。

军代表逐字逐句地宣读中央文件，大概内容是林彪企图抢班夺权，投敌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在场的人都弄懵了，个个都屏住呼吸静听文件，惟恐丢掉一个字。我和所有听报告人的心情一样，不同的是，我感到庆幸，庆幸正在整我的反军问题的时候，林彪摔死了。后来我想，我因林彪而挨整，我也因林彪而得福。实际上，我既没反林，也没反军。

大会最后宣布：清理阶级队伍，按原计划进行，不能急刹车，所有场合的标语，挂像一律不动，保持原样。批判会，发言稿一律不改动。

对我的批判会照样进行，批判我的人们仍然是那么激昂愤慨，满怀无产阶

级豪情，批判我反对林副统帅的罪行，可我的心里却暗笑：我们都是傻帽。

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太谷学习班”也匆匆结束，我的问题也不了了之。一年多了，我妻子音信全无，不久我回北京探亲，妻子对我说，这一年多时间，来过三批外调人员调查我的问题，而且都是山西省公检法的人员。

不久我又见到了张光宇，他告诉我，自军事法院判了无期以后，他就被流放到东北，可喜的是，监管他的连长，曾看过张光宇的戏，认识他，对他有些特殊关照，但他仍觉得前途渺茫，一天他想卧轨自杀，多亏被那位连长及时发现，使他捡回了一条命。他说：“当时我真的死了，咱俩就见不到面了。”这天我俩喝了一瓶二锅头，整整喝了七个小时。

---

### 【昨日心迹】

按：这是文革时的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胡春浦（四川人）1971年7月在“牛棚”中写的一则笔记，追记了支左军人王排长对他们这些专案审查人员的恶劣态度。像他们这样自治区领导干部一级的人都受到如此的对待，更下层的“牛鬼蛇神”的处境可想而知。

## 王排长的“德政”纪要

### 胡春浦

在我被关起审查历史以后，王排长对我折磨的“勋绩”，至少是引起我左半侧麻木瘫痪的原因之一。因此，对他的德政不可忘记。

还是68年关在二所通讯（注：原文如此，应为通讯连）时期，同他根本没有关系，他的黑手就伸进二所。背着当直接管理的姜连长，直接向三个负责具体管黑帮的战士下烂药（注：川语俗话，说坏话，出坏主意）。（我亲自碰到的那是十月的一天下午，我去还电炉，碰到我，正在向三个战士窃窃细语）。过了半个多小时，小王，去□□□家拿东西）我和平常一样要他过我门口顺便带点东西，

他就拒绝了（平时，是他自己到房里来问带不带东西）。接着艾当贤（三个战士中负责的老兵）就来宣布，电炉每人每天只能用一次，每次十五分钟，最多不得超过半小时，小王就来催收拿去了。一次那个叫小龙的副班长还警告我：“就是不许你多用电炉。”于是我就不用了。电炉马□□拿去烧开水，杨□□拿去烤烟叶。都是一用几个钟头，一放几天，他们根本不问，不收。我的电炉就是不准我用。更伟大的□□□，不但公然把电炉长期放在屋里用，而且索性把我的锅子也拿去霸占着不还，最后还把我的挂面一把也拿去享受了。（到哲学研究所才还的）。

既不去我家里拿东西，（马□□连酒都带了两瓶来喝），又不许家里送东西，连香烟也不给我在楼下小卖部买。有一次向姜连长说了买烟的事，他叫我不给战士说，找班长，我才向班长说了；那个叫小龙的副班长才去给我买一条一毛钱一包的烟。

牙粉完了，我向艾当贤说能不能帮我去取一下牙粉，受到艾领导一顿训斥。过了几天又向班长说了，才去给我取的牙粉。从十月王排长下烂药的时候起，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从二所搬到哲学研究所止，是我身体受到折磨，健康受到损害的第一个阶段。除了上面说的生活问题以外，平时艾领导无中生有，想训就训的事很多，就难以记忆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从二所搬到哲学研究所，负责人是黄干事（广东人），他说这叫“统管组”，是革委会党委直接领导的。允许家里送东西，送东西来的时候，可以见面谈话。过了二三天，王排长来了。（十三日从二所搬来的时候，通讯连的小王，也一起来了，完全改变了他在二所时的态度。也处处按政策办事了。）这一段时间，主要是黄干事负责，所以处处是按政策办事的。劳动的时间，也是先分配好谁拉车，谁作助手。根据体力而定的。我总是分配作助手。从车上卸煤，黄干事也先嘱咐一句：“你搬不动大的，搬小的。”三月一次大雪之后，王排长领导在旧人委院内拉煤，就指令我拉一满车块煤往回运。车上没有绳子，也没有分配帮手。这是我第一次。路上的雪才开始融化，车重、路滑，几次都几乎跌倒。真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拖回，放下车，人就要倒了。

一天在人委大院收煤饼子，七八个人劳动，王班长叫马玉槐（注：时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称：宁夏“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马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1月27日夺了他们的权。”)拉车，把煤运到后面去。又叫去两个人卸煤。常乃光去了，没有别人的答应，我也去了。卸煤完后，王又叫我和常乃光跟着出来装煤。外面是马信、徐崇望等四个人装煤。装好以后，王又叫我和常乃光推车。于是推车、装煤、卸煤我和常乃光都做了，根本没有休息时间。而外面四个装煤的人，装完就无事了。我干了三趟以后，就筋疲力尽了，连走路都无力了。第四趟我装好车后就站着没有去推车了。王大喝：“胡春浦为什么不去推车，你自己愿意去卸煤的嘛。走！”我只好跟着走，但连走路也无力了。就慢慢走。王又大喝：“你空手还走那么慢，快点，跟上车！”实在快不起了，还是慢慢走。卸完车，我就在里面的走廊站着，没有跟着车再出去装煤了。等着王排长再来训斥。那里是“深挖办公室”负责人都在的地方，准备他再来折磨的时候，我要和他讲道理。这已经比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滑得远得多了。而是居心把我往死地折磨了。王看见我站在那里，没说什么，我说：“我起不来了。”他叫我去外面去。这时我才看见外面有一个“深挖办”的负责人（五月间同黄干事一起到我房屋来过的，南方人）在那里。大概因为这样，王排长才停止了对我这一次的折磨。

又有天，还是去人委院里劳动，王叫另外一些人和煤饼子，叫我和杨一木卸煤，说是下午筛完口堆煤就行了。筛了一半，我就呕吐，一连吐了两次。到快筛完的时候，我就在医务室外面的防空壕大吐了，中午吃的大米饭全吐出来，雪白一大滩。吐完后我就到和煤饼子的旁边一棵大树下的石头上坐下来休息一下；屁股还没有坐稳，王走来了，我向他说（并指着白色一大滩的米饭），我刚吐了，坐下休息一下，这个根本没有听，立刻恶狠狠地：“把车子拖来装煤（装我们筛出来的大块煤）拉回去。”我就去拖上车去装煤。这时马信他们的煤饼子和完了，马信叫我把车给他，我说：“是王排长指定我拖的。”马信说：“不要整死毯了，”彭原（在上煤）说：“那才舒服咧，”马信从我手中把车夺过去了。

一次在哲学研究所扫地。我扫战士食堂和挨着厨房外面的两片地，杨一木扫厨房门口的一片。别的人扫西面的一片。马信出来得晚，王叫马信扫大坝，马信说：“干净的还要扫什么？”实际也是干净的。后来，王说东南角上放煤炭那一块不干净，叫马信“扫一下”，马信把那一片扫完就回去了。别的人都扫完回

去了。我的动作慢，扫完我那片后，有个受王影响的战士（因为有一次和煤饼子时，王骂我“枉自活他妈（“他妈”两字声音低一些）五十多岁，什么事都不会做”的时候，那个战士也在那里听到的。后来一次包饺子，他就学着王的口气，说我“瞎活五十多岁”。又叫我扫大坝子东边的墙根，正在扫的时候，王又来了，叫我把大坝子都扫了。扫到马信刚才扫过了的东南角那一块我就没有扫，王又叫我再扫一遍。我说“刚才马信才扫过了的”。王说：“叫你扫你就扫。”又一次扫大坝，我顺着扫过去，又退着扫回来，王大叫：“你的眼睛长在屁股上了。”

有一天早上打饭，战士炊事班都一早就出发了。王在厨房打饭。是吃素馅包子（菜包子）；也是冷的，王只给我两个，（最多两个只有三两）我说再给我一个反正要烤了吃。王恶狠狠地：“去，去，还要烤起吃。”对要饭乞丐一样。我们那时每月按四十五斤粮食的定量交伙食费，每天吃一顿粗粮，经常吐。吃三个菜包子也不够定量。然而……

姓王的看见我桌上的群英（注：香烟名），就说：“你现在居于这个地位，还要抽高级烟。”我没有想到群英也是高级烟，我说：“哪里有高级烟？”王拿着群英说：“这不是高级烟是什么？”因此，我就写条叫家以后买两毛以下的烟来。以后就送来黄金叶。一次，王来借了两盒黄金叶，过两天把钱给我；一数，大概是一毛三分钱。一盒这种烟真是物美价廉。过了几天，王又来借两盒，又是给我钱。又过了几天，王又问我还有没有黄金叶，我一看，还有五盒，王就一起拿走了，当然还给我钱的。大概是那一段时间外面的黄金叶不容易买到吧。或者是王没有上街去的时间，从我这里买方便些。一条烟他就买去了九包。

一次四川一个调查材料的谈完走了，王叫着我对大训一顿，说我抽烟向人家的脸上吐烟了。以后，我根本就不抽烟，后来黄干事来了，叫我拿上烟，水缸子去，我又才抽烟的。

一次我专案组的孙正钧来叫我写全面检查，并说明不要写三次被捕的事。王在那里大叫大嚷，要写三次被捕的事。孙又再三说不写，王还坚持非写不可。最后孙说，我交代的材料上说，第一次被捕审讯时宣传抗日的，但从敌人档案中查出的我的口供记录上没有宣传抗日这一部分，是否我写的材料上有夸大。叫我把第一次被捕的情况，如有觉得需要修正的地方，在检查中修正一下。以后王又因为我说了“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这一句话，大嚷大训是“嚣张”。时间



约一二十分钟之久。

住房子，王也无所不用其极的给予折磨。原来住在东面的一个比较大也比较好的房子。（那房顶没有破洞，地上的砖较完整，四方墙壁也没有剥落）。七月，马信出去接受批判。王叫（由小王来说的）我搬到马玉槐原住的房子。把马信的东西放在我原住的房子。马玉槐原住那间房子当西晒。而七月间，正是太阳肆虐的季节。而且那房子，原来哲学所有两个大书橱占了半边，书橱长期没有人管理。由于地下潮湿原因，橱内常常散发出一股叫人呕吐的霉味，王曾经几次说马玉槐房里有一股味道，马几次说明是书橱里的霉味，天气热了就散发出来的。还再（注：原文如此）加上隔壁是烧开水的炉子房。房顶的纸篷已经全部撕掉了，热气也就从顶上通过来了。当然也就更热了。这一次如此调整房子，有必要吗？根本没有必要，无非是王折磨我的办法之一。即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用来折磨我的机会。十月，书橱搬走了。天气也不太热了，我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从上到下连窗户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了。十一月初，要准备烧炉子过冬，并房子，王叫杨一木搬来，这一次是应该调整的。一月，杜林出去了，王又叫我搬到杜林原住的房里，同徐崇望一起。这一次搬房也没有必要，只是因为杜林住的房子太脏而已。当时因为□□□同我闹矛盾，搬开精神上痛快些。所以，这一次搬房子，不管王的想法是什么，我也愿意搬开。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徐崇望、杨一木等出去后，王又调整房。叫杨静仁（注：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被中共中央宣布为宁夏的头号“走资派”）搬到杨一木的房，叫我搬到杨静仁的房，这次搬房显然是脱裤子放屁，完全出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折磨我的机会。杨静仁住的房，一则脏得无法形容，二则靠南边的地上一大滩积水。三则炉也已经戳坏了。四则门关不严，一刮风就自动开了。更坏的是，正当两面的风口上。而三、四、五月又正是宁夏的大风季节。

加上外面走廊里的顶篷也在东南角上的四分之一给风刮掉了。因此，一刮三、四级大风，房里的顶篷就上下扇动起几尺高，房顶的积尘就像风沙走石一样向下面倾泻。加上门关不严，于是刮风时，房顶上的风和从门里来的风汇成一股。王又不准晚上用东西把门顶住。因此，有时一夜门被刮开四、五次。这一次的折磨

有效，达到王的部分目的了。就是从二月二十八日搬进这房子，到四月二十六日清早起床，左半侧就全部麻木了。（这时王已离开了。）这次调整房子，按正规办法，杨静仁不必动，我搬回原来我住的后来杨一木住的那间就是了。后来搬房十来天，王组织黑帮学习的时候说了几句人话，说杨静仁原住那间房子，弄得很脏，胡春浦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杨一木住那间房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住了十来天，房里又那么脏，好像很久没有人住的样子。

1970年4月初，王叫薛排长来叫我和马玉槐二人收拾房间的炉子（包括黑帮住房和部队住房全部），并打扫部队的全部房间和走廊。快完的时候，薛排长有事要出去，向哨兵说，我们把（黑帮）这边的炉子收拾完了就休息，房间叫杨静仁、白玉光打扫。后来王向哨兵说还是要我和马玉槐打扫，不准休息。

看病。痔疮鼓出核桃那么大，明明是用尽全身之力拖一车煤挣出来的。（我从43年春犯过一次严重痔疮治愈后，这么多年没有发过）王训了一顿，不该写在“政治笔记本”上，就走了。第二天上午，又叫挖院坝的地下水管，因为我痔疮痛，不能用脚踩铁铲刨土，小王（当时统管组的一个战士）知道后，才叫我回去休息。下午，小王叫来大夫看了给了药。王排长根本不理的。

十一月九日，我病得那么严重。中午晚上都没有去打饭。王根本没有问过。过了两天，下午我在自来水管处洗东西，王突然问我“看不看病”（可能是问了杨一木），“要看就走。”我以为是王这次要给我看病了。就收拾了洗的东西跟着走。走出门的时间，才知道是常乃光要看病。到了医务室，向大夫说病情，才是他早上起来眼皮有点肿。晚上梦多。我的病，明明是连日劳动过度，引起的高血压和心脏疲劳的结果。但那个雷大夫却给我两瓶哮喘丸，什么话都没说。我要问一下大夫，我不是哮喘病。王恶狠狠地：“走！”不许问。而他却向大夫说，他的嘴角上有个什么疮，要点药。大夫根本没理他。原先我以为是给我看病。后来又以为是给常乃光看病，顺便叫我去；这时才知道是他嘴角有疮，要去看病，顺便叫我去的。

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姓王的要这样的折磨我，千方百计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把我往死处折磨呢？

王在1970年四月初，离开统管组，最后一次组织四个黑帮集体学习时，自己说得很明白。他在前面说了：“有人还哭啊，伤了心啊！”（注：这大概是从徐

崇望那里收集了反映。因为我三次向徐说起王对我的侮辱折磨时，都哭了的；并说过“伤了心”这一句话）“对阶级敌人，就是不能手软。”这一句话，就是姓王对我百般侮辱折磨的正大堂皇的理由。比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来，残酷多了，恶劣多了。

然而，神气十足的、振振有词的、张牙舞爪的王某，绝非主角，至多不过是一个腿子，甚至仅仅是腿子上的一个爪子而已。

或曰，姓王的，是宁夏中宁人，是毛主席号召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军支左人员。同你胡某人无仇无怨为什么他要如此折磨你呢？而且还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答曰：有蛛丝马迹可寻。

从三个方面：一、一九六七年某权威说过：“总之不是好东西。”也是一九六七年另一个次等权威说过：“我一家三十几口要跟你斗到底。”也还是一九六七年上述两个权威的亲信说过：“现在我们的监狱不是国民党的监狱，你再有钱也不行。”从这几句话里就看出埋伏的杀机了。姓王的 1970 年最后的那次讲话中还说了一句：“你等着吧，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也跟专案组姓刘的说的“时间里面有政治”完全是一样的意思，也就说出了“斗到底”、“监狱”、“总之不是好东西”的全盘计划。而说“监狱”的人，正是属于同王、刘两爪子。

本文由作者后人按原笔记录入提供。

---

【年终感言】

##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本刊编辑部

年初，一位读者赠言本刊：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在完成今年这三十期的编辑之后，我们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历史，只有历史，才能寄托国人的心志。为什么？

因为历史中才有事实，历史中才有真理，历史中才有公正，历史中才见民意

与良知。值此礼崩乐坏之时，恭逢精神迷茫之际，历史承担了宗教的这一功能。它不但为人们提供信心，而且提供信念——别看你这今天跳得欢，当心明天拉清单。明天，就是历史！

岁末严冬，气温骤降。悲凉之雾，遍布华夏。然而，君不见，阵阵寒流之中，黄丝带仍在飘动，在树枝，在人心，更在记忆之中。

2009-12-30

---

### 【编读往来】

#### 一、 [丁东的意见：](#)

我认为只要你们精力允许，不必改变目前的出刊节奏。各人有自己的阅读习惯，有人喜欢周刊，有人喜欢旬刊，有人喜欢半月刊，还有人喜欢月刊甚至双月刊。作为电子刊物，五万字左右的篇幅正好，太长了不适宜在电脑上一次看完。关键是保持和提高刊物的质量，不断开辟文革研究的新领域、新角度，争取让刊物的信息量更大些。

#### 二、 [庄菁瑞的看法：](#)

对于顾先生提到的“文章过于冗长……来不及细读”，我感觉这应该是读者自己的问题。作为一个成熟的读者，应该懂得如何选择，取舍所读的文字。没有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是要求每个读者一字不漏地读完的。对《记忆》也是如此。有的长篇文章，作者是为了完整地叙述事件，不得不长。作为读者则可以自由地“处理”故事，有时间看多点，没时间看节选，或者放在一边，等有空再看。这不应该成为编者必须“照顾”的方向。只要每期当中，长，短搭配即可。

不可否认的是，《记忆》越来越受欢迎，读者也越来越多。所以，才有了更多的意见。读者群中各种口味的人都有，众口难调，您二位要把握住方向，不要

被众多的意见搞昏了头。因为无论你们做如何的改动，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所以，要拿定主意，按照自己的宗旨来做。

### 三、马文蔚的建言：

对于文革，抢救记忆，提高认识，是最重要的。能发出来见天日，就是立案、存储、积累，就有利于提高认识和交流。如果希望原创文章多些，就难以固定作者。评论也不宜多，精妙为好，点到则止。评论来源可以更广泛些。

因多年不能公开交流，认识上的差距可能不小。表现在刊物上，也无法讨论，只能各说各话，理解在读者个人。这也许就出现了各期水准上的差异。

我的那篇太长，可能给读者造成麻烦，由衷致歉。顾先生所说，尽量短些，间隔适当拉长些，我同意。

### 四、蔺杨的希望：

我一直很想知道，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包括一些自己也进行文革研究的人们，在文革的认识和了解上，对年轻一代有什么样的期望？我的感觉是，这一段历史好像就封存在那一辈人的生活中了。除了少数有兴趣想要了解的年轻人，其他出生在文革后的人们没有机会了解，作为亲历者也好像无意识地不再谈论这个问题，不想让自己的下一代了解这样的过去。是这样吗？对于年轻一代的文革研究者，上一辈人又有怎样的期待建议和忠告呢？我很希望《记忆》的作者们能够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我觉得，让年轻人了解文革，恐怕不是“如何写文革史”的问题，而是如何写“史”的问题。如果年轻人对历史的了解大多都来自历史课本，那么我估计不管怎么写文革都难以让他们理解，更别说产生严肃的学术兴趣了。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我身边和我同龄的人虽然对文革有所了解，但是已经刻意的不感兴趣了。我觉得很多经历过文革的家庭大概也是有意地不去和下一代谈论这个问题，那么单靠年轻人从社会上、书本上得到的关于文革的点点滴滴，他们是不会理解，也不会感兴趣的。

---

【全年总目录】

## [《记忆》2009年分类总目录](#)

[\(总第11—总第40期\)](#)

### 国史笔谈

丁凯文 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  
(09/1)

徐友渔 国史与党史——《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感 (09/2)

赵 诚 不合时宜的革命——《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杂感 (09/2)

史 云 为了不忘却的记忆——答指正拙著之诸友 (09/3)

陈益南 工人造反活动是文革的重大内容——小议《国史》六卷、八卷之不足  
(09/3)

余汝信、曾鸣 “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读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09/4

司马清扬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上）(09/6)

司马清扬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下）(09/7)

顾训中 一部实录文革的好书——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09/8)

晓 明 一部很好的文革史教科书——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有感 (09/9)

阎长贵 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  
(09/11)

韩江雪 几点感想——读中文大学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 (09/12)

欧阳龙门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09/19)

## 书评与序跋

卜伟华 一本文革研究的参考书——介绍《证照中国：1966—1976》(09/11)

陆小宝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09/12)

阎长贵 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09/12)

周良宵 顾菊英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总序与分序(09/13)

胡 化 《问史求信集》的特色和意义(09/13)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编者的话(09/14)

马雨农 亲历者的责任——读《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 大事日志》有感  
(09/14)

陈育延 我的感言(09/14)

唐 伟 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09/14)

汲 鹏 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09/14)

陆小宝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09/14)

邵燕祥 用记忆留下时代的证词(09/14)

何 蜀 一代青年精英的文革思想史——读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09/15)

余汝信 关于林彪1967年6月16日的信及其他——致阎长贵先生(09/16)

钱家骥 难得之信史——致阎长贵并王广宇先生(09/16)

王海光 着墨青史费端详————读阎长贵、王广宇先生的《问史求信集》  
(09/22)

王广宇 《“四人帮”兴亡》读后——兼谈“纪实文学”的史料价值(09/26)

李 德 《林彪日记》后记(09/27)

丁凯文 司马清扬 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读《林彪日记》(09/27)

陆小宝 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09/29)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作者序(09/29)

## 周恩来研究

小 夏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09/2）

## 林彪研究

丁凯文 实事求是还是曲学阿世？——评叶晖南《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述评》（09/19）

## 江青研究

杨银禄 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09/1）

## 风云人物

王广宇 桀骜不驯的蒯大富（09/1）

萧 木 忆老友徐景贤（09/2）

王广宇 肖力在中央文革（09/3）

陈益南 湖南省革委会中的几位造反派代表 09/4

李晓航 戚本禹在文革中做的一件好事（09/8）

王广宇 也谈聂元梓“被中央文革软禁”和去上海串联（09/9）

王广宇 有关聂元梓的几件事（09/11）

王广宇 关锋与郭冲（09/12）

杜钧福 陈伯达倒台之前指示搞“炼钢自动化”（09/17）

纪坡民 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09/18）

阎长贵 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09/25）

附录：余汝信 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09/25）

余汝信 关于关锋职务的再研讨（09/25）

## 史林一叶



王广宇 清华大学造反派污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 09/4

李 逊 《朝霞》事件 09/4

王广宇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件事 (09/6)

王年一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 (09/7)

余汝信 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上) (09/7)

余汝信 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下) (09/8)

陈 虹 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 (09/9)

余汝信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订正 (09/9)

李晓航 质疑“大闹京西宾馆”流传甚广的一个细节——叶剑英拍桌导致右手骨折吗? (09/11)

一位知情者 读李晓航文 (09/11)

王 锐 文革小报发展繁荣的几个历史片断 (09/12)

忻鼎亮 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 (09/12)

余汝信 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 (09/13)

杜钧福 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 (09/13)

阎长贵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09/14)

杜钧福 外文局“政治谋杀案” (09/14)

陈益南 1969年毛泽东何时到湖南视察? (09/15)

路 阳 “二月逆流”问题中有待研究的一次会议 (09/16)

王 锐 文革小报拾异 (09/16)

杜钧福 批判相对论轶事 (09/16)

王 锐 “炮打司令部”提法的最早出处 (09/22)

余汝信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解读 (09/24)

晓 明 1968年广西平乐县大屠杀 (09/24)

丁凯文 从林彪座机被击落所想到的 (09/25)

杜钧福 “红八月”中的抗暴者 (09/25)

路 阳 对“北京人民公社”名称由来的考察 (09/26)

于鹏飞 256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 (09/27)

杜钧福 中国科学院文革初期的“应地所事件” (09/27)

- 陈益南 1967年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是谁批的（09/27）  
马大观 保卫灵隐寺（09/27）  
舒云 关于“毛泽东1965年春只身到空34师”（09/29）  
陈益南 关于毛泽东1965年春到西郊机场的时间（09/29）

## 蓦然回首

- 赵文滔 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09/1）  
阎长贵 我是怎样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的？（09/1）  
王广宇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09/2）  
王薇 妈妈的“坦白交代”（09/2）  
石天河 面对机枪的那杆叶子烟（09/3）  
杨政 文革时期的朱多锦（09/3）  
央皿 不要参加“走资派”（09/3）  
赵文滔 1976清明：我曾奉命当“打手”（09/4）  
杨耀健 一个小学生的“保皇”与“造反”（09/4）  
周孜仁 1969年：一段旧闻背后的新闻（09/7）  
黄昌国 1970年春节的记忆（09/12）  
胡显中 鞋底风波（09/15）  
陈仁德 独特的挂牌（09/15）  
费明 我童年的文革记忆（09/17）  
钱大川 毛主席头像事件（09/18）  
钱大川 发向天堂的E-mail——清明追思文革中殉难的毛乾民同学（09/19）  
方子奋 老戴的“幸灾乐祸罪”（09/21）  
马文蔚 难忘的“异类”经历（之一）：风暴骤起（09/24）  
不平 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09/24）  
马文蔚 难忘的“异类”经历（之二）：牢房日月（09/25）  
沙漠 孩子，你还记得吗？（09/25）  
陈虹 寻人启事（09/29）

## 忆旧思亲

- 刘自立 羨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修订版）（09/21）
- 晓 明 悼念我的母亲（节录）（09/22）
- 徐伟杰 追忆父亲徐韬（09/25）
- 马大观 亲睹徐季元老师之死（09/25）
- 可 父 死于武斗期间的几个同学（09/25）
- 赵越胜 小青工与“学术权威”——文革后期间学于周辅成先生（09/26）
- 邓伍文 重燃心香——初祭姑妈、再祭爸爸（09/27）

## 乱世民情

- 黄昌国 在动乱年月“走向生活”（09/21）
- 谢声显 给造反派办小报（09/22）
- 杜钧福 我参加的李洪山辩论会（09/22）
- 陈仁德 “桥洞诗人”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09/26）

## 口述历史

- 董国强 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文革历史（09/6）
- 耿昌贤访谈录（一）（09/6）
- 耿昌贤访谈录（二）（09/7）
- 耿昌贤访谈录（三）（09/8）
- 萧信生教授访谈（09/9）
- 文革是一场整人大混战——经盛鸿教授访谈（节录）（09/11）
- 文革与个人恩怨——茅家琦教授访谈（节录）（09/12）
- 我们怎样走进文革——崔之清教授访谈（节录）（09/13）
- 文革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董健教授访谈（节录）（09/14）
- 我怎样成了逍遥派——虞友谦研究员访谈（节录）（09/15）
- 从“现行反革命”到“英雄战士”——康育义教授访谈（节录）（09/16）
- 我与“南京事件”——李西宁教授访谈（节录）（09/17）

“三二九运动”暗含对毛泽东的谴责——李良玉教授访谈（节录）（09/18）  
文革与民族的劣根性有关——王继志教授访谈（节录）（09/21）  
李 逊 马骥、李剑钰回忆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卫队（09/21）  
向泽沛口述、文靖执笔 马思聪、父亲和我（09/22）  
文革使最肮脏的东西沉渣泛起——石征录先生访谈（节录）（09/22）  
汤 铭口述 文 靖执笔 造反、偷书看与下放部队农场（09/25）

## 他山之石

Joel Andreas(安舟) 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上）（09/3）  
Joel Andreas(安舟) 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下）09/4  
Joel Andreas(安舟) 超凡魅力型动员——《坚持特权》第四章（上）（09/6）  
Joel Andreas(安舟) 超凡魅力型动员——《坚持特权》第四章（下）（09/7）  
Joel Andreas（安舟） 关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斗争——《坚持特权》第五章（上）（09/8）  
Joel Andreas（安舟） 关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斗争——《坚持特权》第五章（下）（09/9）

## 比较研究

王 怡（德国） 试论德国第三帝国时期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歌（09/15）

## 文革遗产研究

顾 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一）（09/7）  
顾 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二）——质疑“战争危险”（09/13）  
顾 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三——爱国主义与文革（09/19）  
顾 土 自我否定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四（09/24）

## 文革起源研究

朱 磊 从“自我检讨”到“大批判”——文人理想和信念的彻底破灭（09/17）

## 闲读偶记

顾 土 记住记忆的历史（09/1）

朗 钧 红卫兵诗人郭路生被“自由主义”绑架（09/2）

渔歌子 值得注意的文革文物造假（09/15）

阎长贵 关于两种文革资料集的比较和建议（09/22）

胡庄子 两位主席夫人与一个椰子的故事（09/24）

胡 泊 从《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一文谈起（09/27）

胡庄子 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09/29）

## 昨日心迹

王林、王端阳 父子文革日记（1966.8.1—9.30）（09/23）

## 故纸堆

国务院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09/2）

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09/3）

有关“鸡血疗法”的传单（摘要）（09/3）

新华社 卡翁达总统到京受到数十万群众欢迎 09/4

工农兵学员学什么——1971年清华大学三个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比例分配表  
（09/4）

新华社通讯员 革命大批判的新战场——牡丹江火车站组织旅客开展革命大批  
判散记（09/6）

把毒草歌曲拿出来示众（09/8）

汪东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09/13）

文革教材节选·语文（09/17）  
文革教材节选·数学（09/18）  
顾训中 一组批判刘少奇的文艺节目（09/22）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09/24））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一篇检讨（09/26）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两篇大字报（09/29）

## 小资料

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名单（附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名单）（09/1）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2）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3）  
何 蜀 四川省与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的重庆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名单（09/4）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1970年9月6日)（09/8）  
李 逊 上海人民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与办公机构设置（09/9）  
山西省夺权初期领导人名单（09/11）  
钟 逸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情况（09/12）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13）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14）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15）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09/16）  
山西省各地级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名单（09/17）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18）  
文革期间《红旗》杂志领导班子变迁表（09/19）  
平 遥 文革期间《红旗》杂志文章作者部分笔名（09/19）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26）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27）

## 文摘

- 徐 贲 消遣娱乐和商业化的文革怀旧记忆 (09/2)
- 丁 东 《朝霞》事件的思考——陈冀德《生逢其时》读后 (09/3)
- 鲁 丁 樊立勤谈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 (09/4)
- 丁学良 官僚制与文革 (09/11)
- 徐友渔 关于文革中的大民主 (09/11)
- 陈益南 也谈王白旦的故事 (09/12)
- 李 辉 1963年：母爱教育的批判——红卫兵行为的历史根源初探 (09/13)
- 陈冀德 姚文元曾做过我的指导老师 (09/15)
- 史 学 探寻“三国四方”会议真相 (09/16)
- 武丽丽、赵鼎新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 (09/18)
- 司马清扬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 (09/19)
- 余汝信 林彪座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吗 (09/26)
- 林 达 我为什么也不震惊 (09/26)

## 博客文选

- 胡发云 在武汉大学讲文革 (09/22)
- 朱永嘉 周恩来曾想选调徐景贤和我管文教 (09/26)
- 朱永嘉 谈写作组、余秋雨、姚文元及其他 (09/26)
- 钱大川 从收攒到收藏 (09/26)
- 吴 越 我的传奇性婚姻故事 (09/29)

## 简讯

- 樵 余 重庆文革亲历者积极撰写回忆录 (09/1)
- 德尔苏 关于文革档案的开放情况 (09/2)
- 周东澎 成都部分当年风云人物座谈文革史 (09/4)
- 樵 余 介绍两位重庆老干部回忆文革经历的自印书 (09/8)
- 宇 锋 一部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回忆与研究专著正式出版 (09/12)

- 丁 东 老学者夫妇完成篇幅浩瀚的文革资料汇编——周良宵、顾菊英编撰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09/13）
- 樵 余 黄永胜被列入“共和国开国元勋”名单（09/14）
- 余汝信 成都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编》（09/17）
- 舟 人 陈丕显之子陈小津文革回忆录出版（09/22）
- 舟 人 苏联外交官回忆录披露“九一三”事件新细节（09/24）
- 丁 东 于会泳传新版值得关注（09/25）
- 樵 余 从“四清”走向文革的一个典型——推荐《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09/26）
- 司马清扬 介绍一套资料汇编（09/26）
- 舟人 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续编）出版（09/27）
- 司马清扬 《新发现的周恩来》即将出版（09/29）

## 友情链接

- 《见证北大文革》征文启事（09/2）
- 王 锐 《中国文革小报研究》目录（09/11）
- 李 乾 良知的坚守者——写给如梦轩（09/29）

## 新年回顾

- 本刊编辑部 2008 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09/1）

## 周年寄语

- 本刊编辑部 为《记忆》一周年作（09/23）

## 年终感言

- 本刊编辑部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09/30）



## 本刊特稿

沈迈克（瑞典） 评《记忆》（09/23）

## 编读往来

### 纠错/献疑

张杰来信纠错（09/1）

丁凯文纠本刊 11 期误植（09/2）

华新民来函置疑（09/2）

阎长贵来信订正（09/8）

董国强来信补正（09/8）

杨大庆致函本刊探询武汉决派联络站成立公告发表时间（09/11）

陈益南来信正误（09/15）

李晓航来信纠错（09/15）

旅美读者 Chuang^ Chen 来信纠错（09/18）

丁东来信纠错（09/19）

黄昌国来信纠错（09/19）

阎长贵来信纠错（09/19）

卜伟华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关于林彪的提法（09/21）

尹慧珉更正照片说明（09/21）

胡泊来信纠错（09/22）

胡泊谈江青的“处长”一职（09/25）

蒙木生、唐少杰来信纠错（09/10）

司马清扬来信纠错（09/20）

于鹏飞来信更正（09/28）

司马清扬对上期文章作两处修订（09/28）

### 感想

庄菁瑞谈读后感（09/1）

庄菁瑞来信谈感想（09/2）  
庄菁瑞来信谈十二期及历史研究（09/3）  
哈佛大学教授 Roderick MacFarquhar（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瑞典隆德大学  
教授 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关于本刊的通信（09/4）  
梁京兰谈周伦佐文（09/6）  
旅欧读者晓芝来信谈读后感（09/7）  
庄瑞菁谈丁学良文（09/12）  
马小星谈杨银禄文（09/12）  
陈蔚德谈陆小宝文（09/13）  
庄瑞菁关于陆小宝文的读后感（09/13）  
读者陈闯创信（09/17）  
旅欧读者金瑞来信谈感想（09/18）  
夏继波谈王广宇文（09/21）  
胡泊谈王广宇、冷卫文章（09/21）  
庄菁瑞来信谈民族劣根性（09/22）  
穆学谦谈感想（09/25）  
商羽谈文革中的另类反抗（09/26）  
黄昌国就杨耀健之文发表感想（09/5）  
祝若馨谈顾土文章（09/20）  
黄肇炎补充“四个面向”（09/20）  
庄菁瑞来函谈家庭专辑（09/29）  
赵晓铃来函谈家庭专辑（09/29）  
马文蔚赐函简评本刊（09/29）

**互动**

阎阳生回应卜伟华史实辨正文（09/1）  
孟久余谈十三期史云文（09/4）  
迟泽厚答朗钧。（09/8）  
余汝信简答读者询问。（09/9）  
王广宇答李自茂（09/12）

阎长贵答李自茂（09/16）

庄菁瑞介绍关于林彪堕机的电视节目（09/25）

朗钧对《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一文的几点看法（09/5）

关于王广宇《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的争鸣（09/10）

丁凯文为上期文章提供视频佐证（09/28）

蓝岭来信谈于鹏飞文中一个细节（09/28）

裘贞就余汝信文中的语气提出商榷（09/28）

### **勉励/建议**

冯锡刚来函赐联（09/1）

印红标寄语编者（09/3）

余汝信关于编辑工作的建议（09/4）

澳洲学者孙万国先生致函本刊（09/6）

马小星来函（09/8）

海外读者纪英瑞来信谈安舟文章的翻译（09/8）

邱心伟谈本刊的点击率（09/25）

旅法学者陆长林批评本刊走下坡路（09/26）

丁东肯定本刊的选登博文等作法（09/27）

庄菁瑞不同意陆长林的意见（09/27）

陈益南建议本刊在“主题”上作文章（09/27）

沈迈克对陆长林批评的看法（09/27）

杜钧福来信谈本刊质量（09/28）

顾训中给《记忆》的建议（09/29）

《记忆》编辑的答复（09/29）

丁东建议提高质量（09/30）

庄菁瑞认为众口难调（09/30）

马文蔚主张尽量短些（09/30）

蔺杨对文革研究者的希望（09/30）

### **造反派研究专辑（09/5）**

## 本刊说明

### 造反派研究

周伦佐 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

刘自立 析“人民文革”

徐 贲 群众和“人民文革”

### 蓦然回首

胥勋和 我这个“红色种子”怎么被逼成了造反派

### 文摘

陈益南 《青春无痕》韩文版序

## 文革婚恋专辑（09/10）

### 本刊说明

### 蓦然回首

蒋仁德 结婚悲喜剧

### 故纸堆

有关青年工人婚姻状况的一组数据

### 文摘

周孜仁 “革命年代”的校园恋

陈冀德 我所知道的“戴、闻恋”

刘小萌 文革时期知青婚姻状况

## “五一六”专辑（09/20）

### 史林一叶

王广宇 “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前后

### 蓦然回首

尹慧珉 一场莫须有的大运动——记在干校时的清查“五一六”

杜钧福 我是怎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

### 口述历史

施万春 她是时代的牺牲品——清查“五一六”给我发妻造成的变化

南京大学深挖“五一六”见闻——蒋广学教授访谈（节录）

### 小资料

谁是“五一六”的后台

### 故纸堆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陈伟 “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节录）

## 家庭专辑（09/28）

### 故纸堆

刘 涛 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节录）

康生盛赞 13 岁小女孩向父亲造反（节录）

郭苏扬 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前进（节录）

作家欧阳山之子在批斗欧阳山大会上发言（节录）

一封家信

一封控告信

### 文摘

老 鬼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革命

陈凯歌 在十四岁时背叛父亲

### 乱世民情

严欣久 作家严文井五七干校家书一束

姜东平 在“清队”风暴中倾覆的家庭小舟

### 闲读偶记

何 蜀 文革中的家庭关系值得好好研究

## 支左专辑（09/30）

### 文摘

启 之 “七二〇”事件的预演

高振河 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

李振祥 47军走访组回湘汇报座谈否定“文革”（节录）

### 故纸堆

1967年中央对青海、安徽、内蒙、福建等12省、区支左的批示（摘录）

四川省江油县支左部队转变立场的三个文件

重庆日报 五十四军党委总结文革支左教训

### 闲读偶记

董国强 对《许世友将军逸事》的几点补正

### 蓦然回首

愚 人 军宣队在山西省歌舞剧院

### 昨日心迹

胡春浦 王排长的“德政”纪要

说明：各专辑中的“编读往来”因不是该专题中的文章，均已分别归入“编读往来”栏目的不同小类中。